

**Rural Migrant Workers and the Chinese Dream: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Emotion in *My City Dream***

Hui-Chuan WU

**農民工與中國夢：
《城市夢想》的文化情感政治***

吳慧娟**

*本論文為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MOST 109-2628-H-008-001-MY3）之部分研究成果。感謝兩位匿名審查委員提供寶貴的修改意見，筆者於修訂過程中獲益良多，特此感謝。

**吳慧娟，國立中央大學英美語文學系副教授。

聯絡方式：gracewu@g.ncu.edu.tw

摘要

本文分析中央電視台財經頻道實境節目《城市夢想》所勾勒的當代農民工文化想像，如何藉由「逐夢者」身分重新定位過往被大眾文化視為社會苦難化身的農民工，置換農民工向上流動「失敗」的不滿與憤怒，改寫此群體的底層身分認同，重新擁抱晉升小康階層的中國夢。聚焦於《城市夢想》所描繪的農民工個人生命危機與向上流動的勞動/情感結構，本文挪用並拓展學者柏蘭特 (Lauren Berlant) 與阿曼德 (Sara Ahmed) 分別在《殘酷的樂觀主義》 (*Cruel Optimism*) 與《幸福的承諾》 (*The Promise of Happiness*) 兩部作品中所探討的情感與情緒——樂觀與幸福，探究代表官方論述的《城市夢想》如何轉化與重新形塑農民工的文化情感結構，使其成為體現、在地化與開創當代中國夢的新主體，並且進一步探討夢想敘事所蘊含的文化情感政治。本文主張《城市夢想》正體現了官方敘事對底層勞動群體所進行的情感改造工程，以內在情感的重塑來建立社會大眾對於農民工的新身分認同與文化想像，重新將農民工群體納入向上流動的中國夢，但卻同時又因為喪失了集體變革的可能性，使得農民工更進一步遠離了中國夢所承諾的美好生活。

關鍵詞：農民工敘事、文化情感政治、《城市夢想》、向上流動、感恩

Abstract

With a focus on the intersection between labor, migration, and affects, the paper explores how the narrative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in China shapes and defines the making of a new cultural feeling toward China's rural migrant workers. By looking at how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and the good life orchestrates and recalibrates rural migrants' biopolitics and social relations, the paper studies the linked relation between migrant workers' upward mobility and the discourse of the Chinese dream, interrogating how the workers' failure unfolds other possibilities and associations with the nation's promise of happiness. Focusing on CCTV's reality show, *My City Dream*, the paper examines how the TV show narrates the tension between rural migrant workers' aspiration for a better life and their struggles to survive, and how rural migrant workers' life experience and social discourses compete to write and rewrite the cultural feelings pertaining to the underclass in contemporary China. Specifically, by looking at how *My City Dream* transforms rural migrant workers' from "victims/losers" to "dreamers," a transition that puts emphasis on the remaking of the worker's feelings and interiority, the paper unfolds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emotion in recalibrating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individual and the social. Borrowing from and extending what Lauren Berlant and Sara Ahmed have shown in *Cruel Optimism* and *The Promise of Happiness* regarding how immigrants play as a key figure in our understanding of affects related to the vision of the good life, upward mobility, and happiness, the paper shows how the narrative of China's rural migrant workers as "dreamers," embodies, localizes, and invigorates the Chinese dream.

Keywords: The narrative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The politics of emotion, My City Dream, Upward mobility, Gratitude

一、前言

中央電視台（以下簡稱央視）財經頻道分別在2017年與2019年拍攝了一季十集的真人實境節目《城市夢想》，讓白手起家的企業菁英透過喬裝進入農民工的工作與生活場域，實際體驗農民工勞動的艱辛與生命的困頓，並且在為期三日的體驗結束後，以企業慈善家之姿與農民工家庭重逢，提供物資、經費與其他資源，協助農民工在生命轉折處得以重新獲得生存的動力。在拍攝對象的選擇上，企業菁英皆以具有相當規模的品牌領導者為主，包括：依文集團董事長夏華、閱讀平台《中文在線》董事長童之壘、電纜企業遠東集團創始人蔣錫培、語音人工智能科大訊飛創始人劉慶峰等；而農民工則多為低階勞動力工作者，例如：小店經營者、送奶工、建築工人、玻璃噴雕工、布展工人、高鐵維修人員、廚房雜工等。¹節目敘事除了聚焦於農民工勞動的型態以及闡揚其勞動的貢獻之外，更著重在藉由個別農民工的困境帶出此群體所面對的社會制度結構性問題，並且在節目末尾宣揚相對應的國家宣令和政策，指出國家在改善與提升農民工群體生活福祉的確切作為和未來展望。²《城市夢想》在拍攝與敘事手法上

- ¹ 在兩季共二十集的節目中，僅第一季〈流動的家〉農民工主角梁啟峰為高薪的建築工地工頭，屬於領導階層。節目中的農民工都是第二代或是所謂出生於1980年代以後的新生代農民工，但是《城市夢想》並不特意區分代際差異，而是皆以農民工統稱這些擁有農民身分與農村戶口但卻在城市工作的訪談對象。就官方敘事而言，忽略農民工世代之間的差異，將農民工視為一同質性高的單一群體，凸顯了農民工作為一特定群體的獨特社會現象，也說明了此群體和其他社會階層團體之間的鴻溝。對於新生代農民工而言，在城市中尋求歸屬感的需求更勝於第一代農民工，並且更渴望在城市裡取得不斷向上流動的機會（梁宇廣2011/02/11）。由於本文關切的是農民工群體作為再現符碼所代表的文化意義，以及《城市夢想》作為官方敘事所形塑的農民工與社會大眾之間的群體關係與文化情感政治，而非農民工群體的内部差異，因此，本文並不特意以新生代農民工來稱呼《城市夢想》所再現與指涉的敘事對象。
- ² 節目敘事型態以扭轉社會大眾對於農民工勞動階層的刻板印象為出發點，透過聚焦於其每日工作細節與挑戰來強調其勞動雖然平凡無奇，但卻至關重要。曹默（2017: 71）在其文章中指出《城市夢想》讓觀眾得以看到「平凡勞動者在城市的辛勤與奉獻」，並且「為農民工群體發聲，體現了媒體高度的社會責任和身後的人文關懷，譜寫了對平凡勞動者的真誠禮讚。」（ibid.: 72）儘管對觀眾來說《城市夢想》敘事的精彩之處在於企業家身分的裝扮與揭露，然而曹默指出節目中再現企業菁英體驗勞動底層生活的關鍵在於展現農民工勞動的社會貢獻。關於節目宣揚國家法規，見張敏（2017）與張盼（2019: 53）。

採寫實生命敘事／紀錄片形式，勾勒遷移勞動的艱辛與困難，一方面以農民工自述的方式夾雜旁白的闡述，賦予農民工發聲的機會並提供觀眾貼近農民工生活的第一手「真實」資料，另一方面也透過節目的敘事策略、拍攝手法以及剪接農民工／企業體驗者的獨白，揭露農民工與企業菁英兩者的內在感受。

儘管《城市夢想》兩季共二十集都聚焦於離鄉背井到城市從事不同工作的農民工，但是其敘事結構大致相同。節目的開頭都會先拍攝每集故事主人翁農民工的工作場域，並用旁白形式介紹其工作日常，然後轉而拍攝喬裝的企業菁英離開原先優渥、舒適的領導階層辦公室，以極少的零用金和公共運輸系統前往農民工的工作地點，以新學徒的身分跟隨著作為故事主人翁的農民工生活與工作。³接著，節目會特別聚焦於農民工當下的挑戰，比方說：第一季第五集《姑娘，不哭！》裡梁金梅和弟弟一家賴以維生的壽司飯捲店面臨拆遷的狀況；第二季第四集《媽媽，我想讓妳聽見》的混凝土取樣員吳運國為醫治聾啞母親努力賺錢，而面臨過年也無法返鄉的困境；第二季第七集《春天的期盼》裡的鄧有科在為女友籌錢醫治癌症時遇上失業的問題等。在農民工與喬裝企業菁英相處互動的過程中，除了透過喬裝企業菁英在學習新工作技能所遇到的困難，來陳述農民工工作的辛勞與重要性之外，更會藉由農民工與企業菁英在下班後的生活場域（包括：宿舍、食堂、農民工的居所、開放式的公共空間等）的互動，以旁白的方式簡介農民工過往所經歷的生命挑戰，然後由農民工自述其心路歷程與夢想（著重在傳達其情感體驗），也會以剪輯的方式穿插企業菁英的體驗心得。在處理農民工與企業菁英情緒與情感的部分，節目除了會以鏡頭拍攝角色的肢體語言，來呈現兩者互動的緊密（包括：擁抱、目送、拍拍肩膀或是並肩而坐等），也會以獨白的方式，讓企業家講述體驗生活對於農民工處境的體悟與同理，以及讓農民工傳達對企業菁英的想法與感受。在節目的敘事結構中，農民工當下所遭遇的困難與伴隨而來的情緒反應，

3 《城市夢想》以師徒關係來指稱農民工與企業菁英體驗者的關係，亦即企業菁英體驗者喬裝是農民工在工作場域的新學徒，然而企業菁英體驗者在工作場域外（他們通常與農民工同住於農民工家裡或是宿舍中），也會稱農民工為「師傅」。

通常會演變成農民工與企業菁英的衝突，例如：梁金梅認為企業菁英夏華不理解飯捲店對她的重要性，或是上海企業家王翌不諒解吳運國為何春節不返鄉探親等。兩者的衝突會在企業菁英體驗結束前達成和解。儘管農民工當下所遭遇的困境並沒有解決，但是敘事通常會藉由節目旁白更深入地探究農民工的生命經歷、兩者的交心對談，以及雙方各自對鏡頭陳述自我觀點與情緒（剪接穿插），在體驗經驗的結尾創造一種和諧的氣氛。農民工的困境通常要等到一個月以後，農民工與企業菁英體驗者在企業家所處的城市或公司總部相會後，才可能得到解決方案。體驗結束後，企業菁英會與其領導的公司團隊分享農民工的困境，並且與團隊商量適當的協助方案。節目的高潮則出現在農民工與企業家的重逢，敘事著重在農民工得知「徒弟」真實身分的訝異以及企業家提供協助的驚喜。企業菁英所提供的協助通常不是直接解決農民工所遭遇的困境，而是創業諮商與建議，或是與學習技能相關的書籍與設備，例如：企業家夏華不是幫忙梁金梅找到搬遷的店面，而是提供她其他創業形式的可能性；英語學習機構創辦者王翌給予吳運國和他弟弟平板電腦與終身線上學習資源；家居科技公司創始者倪張根為鄧有科的女友準備了設計相關的書籍，鼓勵她在病中學習，追求自己的夢想。⁴

中國學界多數肯定《城市夢想》以真人實境秀的形式「真實」地呈現農民工的日常生活，提供社會大眾深入瞭解農民工群體的管道，以及該節目在重新形塑社會大眾對於農民工群體的文化想像上所做的努力。李穎欣（2019: 176）在〈農民工群體的影像書寫〉一文中指出《城市夢想》打破了農民工「一味地佔用城市的資源或者擾亂城市的秩序」的污名，「以『夢想』為敘事主題以及『逐夢者』的身分建構」，展現了「農民工純樸善良的性格、努力樂觀的態度和吃苦耐勞的精神。」⁵從李穎欣的評論中可見「夢想」作為節目名稱與敘事模式的重要性和原先大眾媒體加諸於農

4 《春天的期盼》結尾的旁白指出倪張根後續為鄧有科找到就業機會，並且提供其女友進行化療的部分醫療費用。

5 多數評論家都指出《城市夢想》中所塑造的農民工形象多具備對夢想與家庭的堅持、純樸、樂觀與積極向上等性格。見張盼（2019: 53）、張敏（2017: 20）與王暉（2018: 33）。

民工群體的污名標籤息息相關，一方面道出了農民工遷移勞動的目標是為家庭尋求更好的經濟條件與發展機會，另一方面更藉由重新定義農民工為「逐夢者」，透過人人皆有夢想，營造農民工與節目來賓（企業菁英）和觀眾的連結與情感，形成新的社會關係。孫建（2017: 55）在其文章中也指出，夢想是連結參與節目體驗的企業菁英與農民工的核心。因此，王暉（2018）與王平（2018）都主張《城市夢想》的敘事主題與模式——社會菁英體驗農民工在城市為夢想付出的艱辛，凸顯了節目企圖消弭「社會階層的隔閡與歧視、彌合社會階層的精神與生活差距，強化社會階層間情感的交流」（王暉2018: 34）。如此一來，夢想不但成為節目中企業菁英進入農民工生活的視角，同時，企業菁英過去白手起家，為夢想奮鬥的過程與缺憾，也成為他們理解農民工艱辛的起點，進而產生情感上的連結與同理，拉近了兩者在成長經驗和社經地位上的巨大差距與衝突。⁶

儘管評論家都認為《城市夢想》在重新描繪農民工群體的文化形象與形塑新的社會階層關係都有別於以往農民工在大眾文化中的缺席、失語或負面的刻板印象；然而，本文主張以《城市夢想》為代表的官方再現，必須被置放在廣義的媒體與文學的農民工再現歷史中，才能更完整地呈現以「逐夢者」作為21世紀農民工敘事基調的獨特性與文化意義。本文將央視財經台製作和播放的農民工再現節目《城市夢想》，視為國家官方頻道透過大眾媒體文化對於農民工（節目角色與社會群體）與中產階級（觀眾）關係之介入與重塑的文化媒介。在概念上，本文借用葛蘭西（Antonio Gramsci）文化霸權（cultural hegemony）的概念，將央視財經台的《城市夢想》理解為國家作為文化統治領導者，藉由官方傳媒以製造同意（manufacturing consent）的方式，柔性地對中產階級市民宣導新世紀農民工的文化形象與傳播新的社會階層關係，吸納不同社會階級之間的矛盾與衝突，實現社會穩定。⁷此外，《城市夢想》的再現形式有其特殊意義：

6 在每集的節目裡，鏡頭都會聚焦於社會喬裝菁英的內心獨白，請他們分享體驗的心得。參與者多在此刻表達他們從「外來者」、「他者」身分轉變為農民工群體一分子的共感經驗。體驗者也常在與農民工一同返鄉探親時，感慨自己也經常為打拼事業而犧牲了與家人相處的時間。

7 關於葛蘭西文化霸權概念與製造同意，見孫晶（2001）、張永宏與李靜君

一方面其敘事架構與內容都是被篩選與編排過的，因此在文本敘事上可說是「虛構」的；然而，真人實境節目的再現形式又有其「真實」指涉的對象，以及超越文本敘事內容所指涉的「現實」。在「虛構」與「真實」敘事結構的交織下，節目所建構的農民工與觀眾的社會關係，有超越文本的多重指涉，進而形塑觀眾／社會大眾與農民工群體（虛構與真實）的「現實」社會關係。因此，本文將採用跨越再現媒介形式的閱讀方式，以當代影視文化與文學書寫中農民工的樣貌作為《城市夢想》敘事生產的社會、歷史與文化背景，探究央視以「逐夢者」打造21世紀的新農民工形象的文化情感政治。

在當代中國的語境和文化想像中，農民工群體通常被視為經濟發展的「問題」而非中國夢的見證者。⁸如同《城市夢想》在節目中不斷地強調農民工為中國城市建設與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角色，然而，在大眾論述中，三農問題卻被視為中國崛起最大的危機。⁹農民工敘事在聚焦與體現此群體所面臨的生活苦難時，一方面試圖要求政府機關與社會大眾正視農民工的困境，另一方面卻同時強化了農民工是當代社會問題的大眾意識，他們因此成為中國夢裡隱而不見的幽魂。¹⁰相較於農民工如幽靈般的存在，在中國

（2012）。

- 8 當代農民工對於中國夢的表述可從電影再現窺見，請見張權生（2018）。關於農民工與中國夢的官方論述，見楊志明（2018）。大眾傳媒中也不乏農民工實現夢想的發達敘事（見李清〔2011〕），但本文關注的是《城市夢想》如何挪用向上流動失敗的生命敘事，重新連結農民工個人夢想與國家發展論述之間的緊密性。
- 9 關於三農問題與中國經濟發展，見溫鐵軍和楊海霞（2013）與焦必方（2005）。成兆文（2004: 15）主張解決三農問題才能實現中國小康社會的夢想；中國農業部部長韓長賦（2013）也申明要實現中國夢，必須先解決農民工問題，由此可見農民工的向上流動是實踐中國夢的關鍵。關於農民工實現中國夢的現實困境，見劉紫涵（2013）。
- 10 石勇（2013: 40）在探討農民工與中國夢的採訪報導中就指出對於新生代農民工而言，中國夢「不僅僅是描繪『願景』，更是一種國家的承諾：每個人，無論他爸是不是李剛，都能機會平等地通過努力實現夢想，改變命運」。然而，就其採訪對象新生代農民工龍華金，中國夢的承諾帶來的卻是一連串的失望與挫敗。石勇在其文章中指出政府若要實現中國夢的承諾，首先得先確保農民工享有同等的社會資源與公平正義，才能確保其社會流動。關於後社會主義中國的「中產階級」發展敘事，見黃宗儀與李紀舍（2010）。都會中產女性的成長發展敘事，見黃宗儀（2020: 51-81）。

崛起與中國夢的論述中，新興「中產階層」一直是備受關注的對象。黃宗儀在《中港新感覺：發展夢裡的情感政治》（2020）一書就從區域發展的地理政治研究視角切入，多以「成功」向上流動的發展敘事，探討中國夢所蘊含的情緒與情感。在黃宗儀的研究中，雖然也觸及從內地移民至香港的弱勢女性，但尚未談到農民工與中國夢的文化再現。本文試圖藉由探究農民工的城市夢想敘事以及其情感政治所帶有的階級差異視角，拓展黃宗儀的研究——「中產階級」發展敘事以及其中國夢，闡述《城市夢想》所勾勒的當代農民工文化想像，如何吸納、協商與置換農民工「失敗」向上流動經驗中的不滿與憤怒，改寫此群體的底層身分認同，使其重新擁抱晉升小康階層的中國夢。¹¹

本文主張《城市夢想》作為2017年以後新農民工故事類型的重要性，正在於其敘事結構所蘊含的文化情感改造工程與身分重塑——苦難的蛻變與幸福的未來。《城市夢想》的農民工敘事不僅體現了當代國家語境下勞動底層的情感經驗，同時也揭示了官方論述裡勞動、遷移與中國夢的文化情感。¹²本文藉由分析《城市夢想》對於底層勞動群體幸福與美好生活的勾勒與想像，探究新興的「逐夢者」論述如何形塑當代農民工的生命治理與社會關係，並且進一步探討農民工（個人與群體）向上流動的失敗如何開啓中國夢的另類未來。本文主張《城市夢想》真人實境秀的農民工敘事，在形式上有超越文本敘事形塑大眾文化對於農民工群體的「真實／現實」社會關係與文化情感結構。聚焦於《城市夢想》所描繪的農民工個人生命

11 儘管《城市夢想》的農民工發展敘事都僅停留在勾勒以及賦予農民工發展的未來想像，而非描繪其成功地向上流動的發展敘事，然而，夢想敘事結構中所投射的未來性以及所展演的情感政治，將農民工當下發展的「失敗」置換為即將到來的「成功」，重新形塑農民工的底層身分，將之打造為中國夢的新主體。本文在指稱農民工向上流動的「失敗」或「成功」時，對於如何定義農民工向上流動的「失敗」或「成功」有所保留，因此將之放入引號中；然而為求精簡，之後在正文中皆省略引號。

12 本文對於「中國夢」的定義一方面奠基於黃宗儀在《中港新感覺》所指的伴隨著「中國崛起」而生的發展論述，包括國家層面和大眾文化層面，特別是其所蘊含的向上流動神話，因此涉及農民工的自我實現如何與國家發展接軌的探討，亦即個人與社會、國家的關係；另一方面則專門指涉《城》中農民工冀望在城裡尋求美好生活與幸福的夢想，見黃宗儀（2020: 11-18）。

危機與向上流動的勞動／情感結構，本文挪用並拓展學者柏蘭特（Lauren Berlant 2011）與阿曼德（Sara Ahmed 2010）分別在《殘酷的樂觀主義》（*Cruel Optimism*）與《幸福的承諾》（*The Promise of Happiness*）兩部作品中所探討的情感與情緒——樂觀與幸福，探究代表官方論述的《城市夢想》如何藉由逐夢者身分，重新定位過往被大眾文化視為經濟發展中的弱勢群體的農民工，使其成為體現、在地化與開創當代中國夢的新主體，並且進一步探討夢想敘事所蘊含的文化情感政治。

由於本文聚焦於《城市夢想》敘事中農民工情緒的流動與情感的置換，專注於特定的農民工個體文本分析，較能凸顯節目的夢想敘事結構如何挪用與形塑農民工的內在情感結構。因此，本文選擇以第二季第五集《我是你的臂膀》裡的身障農民工的生命發展敘事作為主要的分析範例，用意在於強調《城市夢想》如何拓展與想像「農民工」作為新世紀國家夢想敘事的新主體之概念與指涉對象，透過節目敘事所隱含的農民工內在情感改造工程，將身障者形塑為持續發展中國夢不可或缺之推手。《我是你的臂膀》對於身障農民工殷彬的刻畫，聚焦於他在逆境中仍不斷投注於追求向上流動的生命精神，顯現了在新自由主義主導下的經濟發展中，國家（《城市夢想》作為國家媒體的運作機制）對於個體生命治理的規範，包括：獨立自主、個人化、對自我生命如何發揮最大經濟效用的規劃與掌握等概念，已經完全滲透到身障農民工群體，強調其不畏挫折和艱難，將自我投身於中國的發展論述之中。¹³再者，《城市夢想》以家庭作為農民工

13 本文分析聚焦於《我是你的臂膀》中作為身障農民工的殷彬，旨在強調《城市夢想》作為官方敘事在投射與打造中國夢未來主體的涵蓋範圍，當節目敘事將殷彬與他的聽障女兒殷黃妮描繪為當代中國夢之新主體時，不僅強化了《城市夢想》如何轉化殷彬身為農民工與身障者的雙重弱勢身分，也同時透過其父女代間的責任與照護，闡述中國夢的新主體如何擔起代間夢想傳承的責任與交替。儘管《我是你的臂膀》對於身障者的再現，與過往中國身障者敘事傳統聚焦於成為社會有用之人的精神相近，但是其在農民工殷彬內在情感的刻畫上，不僅止於正面情緒的雕塑與強化，而仍然賦予其傳達負面情感的敘事空間，如不滿、失望、憤怒和憂鬱等，與《城市夢想》系列的其他農民工敘事情感政治一致，更凸顯了本文主張農民工的夢想敘事，雖然企圖以逐夢者重新界定農民工的身分認同，但仍然挪用了農民工敘事傳統中的苦難與悲情作為主要的情感政治表現。關於中國的殘障者敘事與再現政治，見Dauncey（2002）、Kohrman（2005）與Knight（2006）。

向上流動夢想慾望的核心，雖然節目多數聚焦於隻身在城市裡奮鬥的農民工，但是農民工所勾勒的向上流動夢想皆以改善家庭整體生活狀況，或是為特定年幼或年長的家庭成員籌措醫療費或教育費。因此，本文在探討農民工向上流動情感的置換與轉變時，企圖從農民工與家庭成員的生活與互動情感切入，凸顯《城市夢想》所勾勒與想像的個體經濟發展與向上流動，是有別於西方向上流動論述（或是美國夢）中的個人主義。相對於《城市夢想》其他集數中隻身在城市生活的農民工主角，他們僅能透過自我陳述或旁白來勾勒對家人與家庭的情感與夢想，《我是你的臂膀》聚焦於同在城市生活的殷彬一家三口，敘事結構上賦予三位家庭成員互動的細節與情感的獨白。¹⁴本文希望藉由《我是你的臂膀》的細讀，闡述《城市夢想》以家庭作為向上流動核心的文化想像，不僅重新打造農民工的追夢者身分，更進一步複製與再生產下一代農民工家庭出身的新夢想主體，拓展中國夢裡個人向上流動與家／國發展的緊密性。

在分析《城市夢想》向上流動敘事的情感流動與置換上，本文倚重柏蘭特在其同名專書的「殘酷的樂觀主義」之概念。柏蘭特指出：

當你慾望的東西成為你繁榮發展的阻礙時，便形成了一種殘酷的樂觀主義關係。這可能涉及食物或是一種愛戀關係；也有可能是對美好生活的幻想，或是政治專案。也有可能是更簡單的東西，像是一個保證可以改善你生活方式的新習慣。這類樂觀的關係其本身並不殘酷。只有當你最初所投注依附的物體成為阻礙你達成目標的障礙時，才變得殘酷。（Berlant 2011: 1）

柏蘭特主張對於美好生活的慾望，例如：向上流動，對於備受當今經濟危機威脅的移工群體而言就是一種「殘酷的樂觀主義」，因為移工唯有

14 《城市夢想》敘事中農民工當下的危機通常都是與留守家鄉父母或未成年兒女相關，但也因為距離的問題，節目較無法直接訪談留守老人或孩童，僅能由在城市的農民工單方面陳述其向上流動夢想與家庭之間的關係，或是其對家人的情感。舉例而言，〈我在廣交會〉的農民工尚海洋，其最大的希望就是改善老家的生活，而最牽掛就是年邁的母親突然倒下，因此，當他手機聯絡不上母親的時候（當下危機），節目就聚焦在他焦急的肢體語言與掛念、擔憂的情緒獨白。〈高鐵守門人〉的王克輝為了擔負中風父親的醫藥費離家工作，某日突然接到電話說父親病重（當下危機），請他回家一趟，節目與企業菁英體驗者便跟隨著他回家探望父親，節目接著透過他在家與父親的互動傳遞父子間彼此的情感。

將其心力不斷地投注於向上流動的幻想中，才能繼續面對當下貧乏的生活與憂鬱的狀態。¹⁵本文借用柏蘭特的概念解析《城市夢想》如何勾勒與建構農民工的生存狀態與情感經驗，一方面企圖探討節目對於農民工的再現為何倚重向上流動敘事的慾望，另一方面希望藉由《城市夢想》的農民工敘事拓展柏蘭特「殘酷的樂觀主義」之概念，闡述殘酷樂觀的中國在地指涉性以及樂觀主義所形塑的跨階層社會關係。

本文關注農民工作為中國改革開放後相應而生的新社會群體以及全球分工底層，在勞動遷移、移民與情感研究上的相關性與特殊之處，尤其是中國社會對於此群體文化情感的轉變。在情感研究中，移民與當地社會的文化情感一直是許多研究者所關注的議題，柏蘭特和阿曼德在談樂觀與幸福時，都特別談及了這樣的情緒與情感如何驅動與宰制移民個體與群體對於遷移與未來的想像與行動；海默（Ben Highmore）在談文化情感時，更以移民敘事軸線聚焦於移民主體與社會大眾在情緒上的變化與轉換，來談移民經驗在情感研究上的特殊性。在海默針對來自加勒比海地區的英國移民研究中，他發現移民敘事中存在著一種普遍的文化情感，亦即這群移民在遷移之初對於英國多抱持著天真、樂觀的期待與看法，但移居後的生活經驗卻會讓他們從最初的樂觀轉變為失望，而媒體文化與社會大眾將此群體視為「社會問題」，更使得這群移民從夢想的實踐者，成為英國社會治安恐慌的特殊群體，而帶有負罪感。這股瀰漫在1930和1940年代英國社會當中的情緒——天真／失望、受害者／威脅、社會問題／解決方案，一方面展現了移民敘事軸線從充滿希望轉為失望的歷程，顯示了移民群體經驗中情感的轉折，另一方面也說明了文化情感並非單一不變，而是一種持續在過程中發展的狀態（Highmore 2017: 93-95）。在海默的分析中，移民文化情感的轉折與轉變，不僅是移民因應生活環境與生命際遇所積累的情緒與情感，更與文化媒體與社會論述緊密交織。本文藉由分析當代中國影視媒體對農民工群體文化情感的轉變，深化移民研究與情感政治研究裡對於境內移民情感經驗的探討：一方面從跨國移民所遭遇的種族歧視問題，轉

15 柏蘭特對於移民與「殘酷的樂觀主義」的詳細討論，見Berlant 2011: 161-189。

向探究農民工的境內遷移與勞動，因城市／鄉村身分所面臨的公民差別待遇以及戶口制度與身分限制，如何改寫農民工對於幸福承諾與美好生活的想像，以拓展阿曼德和海默在移民、種族與情感研究上的論述；另一方面聚焦於經濟發展與階級差異所衍生的情感結構與情感文化，進一步探討農民工作為境內移工與國家、中國夢之間複雜的情感政治，闡述國家發展論述與勞動階層之間親密又矛盾關係。

二、從苦難的化身到逐夢者的農民工敘事

《城市夢想》以逐夢者重新樹立農民工在媒體再現與文化想像中的樣貌，一方面展現了節目冀望扭轉當代農民工刻板印象的企圖，另一方面更藉由夢想的敘事結構與情感，化解了農民工與國家經濟發展兩者之間的矛盾與對立，重新建構底層群體向上流動的中國夢。¹⁶過往被稱為「盲流」、「民工潮」與「弱勢群體」的農民工（張慧瑜2014: 71, 97），在《城市夢想》中搖身一變成爲「逐夢者」；這樣的轉變，除了讓農民工得以鮮明的個性、獨特的成長背景與清晰的勞動過程和身分呈現於大眾媒體，一改過去如「民工潮」和「盲流」修辭所隱含的烏合之衆的寓象之外，更透過如此個人化的夢想敘事結構，展演並翻轉農民工在改革開放後的內在情感，重塑了農民工群體向上流動的迷思，以修補底層群體與國家發展之間的矛盾與斷裂。¹⁷

相對於新世紀以來的農民工文化再現多聚焦於底層群體的苦難，《城市夢想》以逐夢者的身分重新形塑農民工的形象，打破了農民工在菁英作家、先鋒藝術家與影像工作者視角下的人道關懷敘事想像。江臚生（2016:

¹⁶ 本文主張《城市夢想》的農民工夢想敘事結構特殊之處並非在於讓農民工講述自己在城裡奮鬥的夢想，而在於其以逐夢者打造農民工的文化身分與想像。農民工自我表述的城市夢想文章，散見於各類型的打工者書寫，如姬鐵見（2018）的《止不住的夢想》、范雨素（2017/04/25）以自傳體寫成的〈我是范雨素〉，或曹穎（2009/01/05）的〈一個外來打工者城市夢想〉。

¹⁷ 媒體對於農民工的稱呼隨著年代有所不同，「盲流」的說法最初出現於1952年，在1995年又再次出現；「民工潮」的說法出現於1989年；2002年官方正式將農民工群體視爲「弱勢群體」關於民工潮發展的簡史，見溫鐵軍（2005: 464-473）。

116) 在《新世紀農民工書寫研究》一書中指出「在當代作家的話語想像之下，農民工大都成了苦難的化身」；張慧瑜（2014: 103, 108）在探討新世紀之初以農民工作為拍攝主題的「地下電影」和「地下紀錄片」以及先鋒藝術家的作品時，也指出在這些媒體再現中「『農民工』的修辭已經脫離了早期在現代化邏輯下所建立的樂觀主義敘述，而成為一種社會苦難的象徵」。¹⁸在底層苦難的敘事結構中，農民工遷移勞動的經驗被簡化為現代經濟發展的受害者，而其生命敘事與情感被扁平化為單一、停滯的痛苦。¹⁹《城市夢想》正是在多以底層苦難作為勾勒農民工生命經驗的文化生產及歷史脈絡下，衍生而來的另類農民工敘事——以「逐夢者」所隱含的正面、積極、樂觀和上進精神，取代農民工作為社會苦難的化身。

央視透過財經台轉播《城市夢想》，重新形塑農民工在大眾文化中的形象，凸顯了其所欲關照與中介的社會階層關係——農民工與中、上層階層。就敘事結構中所指涉的農民工與企業菁英的跨階層相遇，以及企業菁英帶領公司團隊創造協助農民工的多元庇護計畫而言，《城市夢想》一方面將農民工從「苦難者」的被動角色轉化為積極面對困境與追求夢想的「逐夢者」；另一方面則是邀請央視財經台的主要受眾跟隨著節目企業菁英的生活體驗，重新認識與接納農民工群體，一起參與一場社會與文化改造工程。²⁰節目敘事以城市作為農民工夢想的場域，不僅點出他們在當代中國經

18 關於農民工、貧窮、苦難與底層敘事，見江臘生（2016: 114-120）、彭維鋒（2015）、劉暢（2017）。從人類學研究切入農民工苦難的專書，見郭于華（2011）。在社會學研究中，江立華和谷玉良（2016: 119-122）指出雖然苦難研究一直是社會學切入農民工研究的視角，但他們主張應該也關注農民工的幸福研究。

19 郭春林（2016: 61）指出儘管在2014年中國農民工已達到2.7億人，但「他們身上除了貧困與艱辛的生活經歷外，既不具有意識形態的代表性／典型性，也沒有媒體工業需要的故事」，因為觀眾偏好具有輕鬆、娛樂性質的成功案例。郭春林的研究不僅說明了在《城市夢想》出現之前，農民工在中國電視媒體中缺席的因素之外，同時也再次凸顯在大眾意識形態中農民工等同於「貧困與艱辛」的化身與象徵。

20 央視選擇在財經頻道而非農業農村頻道播出以農民工為主角的《城市夢想》，一方面除了希望能改變社會大眾（財經台觀眾）對於農民工的刻板印象之外，另一方面財經台的主要功能在傳遞國家經濟發展目標與政策方向，透過《城市夢想》的敘事結構，財經台在宣導目前針對農民工在城市就業規範的政策修正與走向之外，同時也強調以農工作為中國夢新主體的現代經濟發展敘事旨在

濟發展現代化與城市化中當下與未來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同時也拉近節目觀眾（城市裡的中產階級）與農民工的社會關係，重新設定城市作為共享向上流動夢想之地所包含的對象與群體。然而，節目敘事將逐夢者身分的建構聚焦於農民工內在情感的形塑，而非資源的直接投注或是制度結構性的重建，也使得農民工向上流動的夢想最終僅能呈現為節目敘事中跨階層相遇的「驚喜」或是「奇蹟」。²¹這份驚喜與奇蹟，透露了農民工逐夢者的新文化形象，依然是被擺放於帶有階級差異與「他者性」的被凝視位置。

雖然《城市夢想》將農民工形塑為21世紀中國夢的主體，然而，不論是節目敘事結構本身所帶有的農民工身分與情感的轉換，亦或是官方論述企圖扭轉農民工在文化再現脈絡中，從苦難的代表轉變為逐夢者的歷史進程，都體現了農民工作為（過去與當下）中國夢「不快樂檔案」的象徵性代表。以跨國移民作為其「不快樂檔案」（unhappy archive）研究中的象徵群體之一，阿曼德（Ahmed 2010: 18）指出追求幸福的夢想本就不公平：「我們必須體認到幸福的承諾是建立在別人的痛苦之上；有人受苦，『我們』才得以保有美好的生活。」（ibid.: 195）在中國改革開放的發展脈絡下，農民工一直扮演著中國夢裡「暫時」被犧牲、需要等待才能完全取得現代公民身分與權利的弱勢群體。不同於阿曼德在書中討論的跨國移民，他們對於遷移與追求幸福的夢想投射多是建立在個體對於向上流動慾望的投注，近似於白手起家的個人發展命題，《城市夢想》裡對於農民工過往向上流動失敗的經驗的描繪，以及其勞動對於建造與維持城市運作的重要性的陳述，都使得農民工的城市夢想帶有家／國的群體性，亦即農民工的自我實現與改善家庭現況和國家經濟發展之間有著無法切割的家／國關係。因此，《城市夢想》以旁白形式或是農民工的自述來描繪農民工過往與當下的生命困境，以建立農民工的苦難形象，是相當重要的敘事策略。儘管在官方論述與國家語境之下，《城市夢想》都企圖翻轉農民工

農民工生命治理與內在情感結構的都市化與市民化。

21 〈媽媽，我想讓你聽見〉的企業菁英體驗者王翌以「驚喜」來形容他與農民工吳運國的重逢，而《我是你的臂膀》的農民工殷彬則以「奇蹟」來形容他與企業菁英蔣錫培的重逢。

作為中國夢的「受害者」；然而，節目敘事透過農民工向上流動失敗的自我敘事，將農民工向上流動的個人慾望，轉化為家庭發展與國家計畫經濟之必須；節目雖然將農民工描繪為國家計畫經濟之下的不快樂主體，但肯定他們不斷地將勞動與生命力投注於家庭與國家經濟發展的貢獻，使之成為中國夢的未來主體。亦即，《城市夢想》要塑造農民工的「逐夢者」身分，必須處理與講述農民工過往向上流動失敗的痛苦與不快樂，將之描繪為一種已成為過去式的「歷史」經驗，才能重新改寫農民工與中國夢之間的關係，並且進一步藉由農民工的文化情感改造工程，拓展與普及化中國夢的幸福承諾，而讓當代農民工成為中國經濟發展敘事中的新主體。

中國經濟發展夢所承諾的美好生活與幸福的承諾，在農民工群體中有著特定的形式與指涉。在《城市夢想》中，城市之所以成為當代農民工的發展夢，除了其作為區域經濟發展的核心之外，與中國的戶口制度息息相關。²²儘管中國政府政策不斷地針對農民工群體在城市與農村戶口之間轉換的難題上做調整，然而，中國的戶籍制度如同一堵無形的國界，限縮了農民工遷徙移居的選擇。少了城市戶口的身分，農民工較難在工作的城市中取得與城市居民相同的公民權與福利，造成了「公民身分差序」（吳介民 2011: 55）。²³戶口制度無意中成為一種劃分誰能享有追求幸福、美滿生活權利的階序關係。阿曼德（Ahmed 2010: 133）主張跨國移民的敘事體現了「公民身分成為一種決定誰能優先享有幸福的技藝」，不管是在殖民體制下的英國或是提倡自由移民的美國，公民身分成了幸福的承諾，而「非公

22 關於戶口制度的發展與變革、農民工的遷移勞動與中國經濟，見Cai and Wang (2008)。

23 關於戶口制度所造成的「公民身分差序」概念，見吳介民（2011）。由於篇幅有限，加上本文著重在戶口制度城鄉二元劃分所產生的「公民身分差序」，如何影響農民工將城市視為追逐向上流動夢想的場域，本文對於戶口制度的討論不盡完善。但如同《城市夢想》在節目結尾會出現針對農民工因為不具城市身分所遇上的問題提出政策改革方案／指引的宣導片段，中國境內不同城市對於過去城鄉二元制的戶籍制度已經進行多次修改以及導入新的居住證政策，例如：深圳、上海和成都市等（孫偉、夏鋒2018: 27-29），企圖改革戶籍制度所造成的公民福利落差與差異對待問題。關於戶籍制度的改革與放寬，見孫文凱（2017）。關於戶籍改革對於人口流動影響之研究，亦即排除身分差異是否會影響農民工遷移至城市的驅力，見李沛霖（2021）。

民如欲取得幸福的承諾，得先證明自己擁有相當的條件」。在中國政治經濟的發展脈絡下，戶口制度所造就的農民工的「公民身分差序」問題，使得城市與城市身分成爲農民工取得向上流動夢想的實際場域與文化象徵。²⁴

《城市夢想》敘事重新形塑城市與農民工之間的關係，透過跨階層的相遇與企業菁英所展現的慈善精神，將農民工原本在城市所經歷的不友善對待，轉化爲充滿「奇蹟」與「驚喜」的各種可能性，使得農民工得以重新擁抱城市所代表的當代中國文化象徵——美好生活與幸福的承諾。

《城市夢想》裡農民工的夢想敘事結構，將農民工從「底層」、「受害者」的被動位置轉化爲具有精神內涵與充滿希望的逐夢者，闡述其得以成爲未來城市居民的人格特質與社會價值，積極參與國家經濟發展所勾勒的現代性。²⁵筆者認爲《城市夢想》裡的農民工夢想敘事結構——農民工與企業菁英的相遇，除了如其他評論家所言，提供了不同社會階層間的交流以消弭偏見之外，同時也透過這樣的相遇，重新建構農民工的內在情感世界，將之形塑爲具有體現中國改革開放後文化價值的未來中間階層主體，而化解了農民工與社會、國家的矛盾與衝突。²⁶在節目的敘事結構裡，農民工與企業菁英的相遇成了將農民工從「憂鬱的移工」（melancholic migrant, Ahmed 2010: 144）轉變爲得以獲得「自由追求幸福」（freedom to be happy, *ibid.*: 133）機會的主體，說明了如果農民工願意放下底層敘事中的痛苦與磨難，重新相信與擁抱向上流動的可能性，農民工群體也能夠擁有國家經濟所承諾的幸福和與城市居民同等的發展權與公民權。也因此節目中農民工與企業菁英相遇的重要性，並非在於提供實質性的協助，而是賦予農民

24 關於農民工身分無法轉換爲新工人的問題探討以及其與戶籍制度的關連性，見潘毅、任焰（2018: 102-115）。研究指出對於新生代農民工而言，亦即1980年代以後出生的農民工世代來說，夢想（包含向上流動）而非金錢對他們來說才是驅動其遷移勞動的動機，見秦昕和徐敏亞（2013）、胡文嘉（2012）、《華夏星火》（2007）。相較於第一代農民工而言，新生代農民工更相信透過個人的奮鬥和學習專業技藝，就能成爲白領階級（李和平、吳焱2011: 98）。

25 江臘生（2016: 114-124）主張作家的想像性農民工敘事僅聚焦於其苦難而缺乏情感深度；王瓊（2015: 62）在談農民工電影題材與中國夢時也提及電影敘事過分聚焦於農民工的苦難，而顯得過分煽情。

26 關於節目作爲增進社會階級互相理解與交流的論點，見王暉（2018: 34）、王平（2018: 28）與張敏（2017: 21）。

工情感結構轉向的契機與重塑其生命敘事的平台。透過展演農民工內在情感從憂鬱轉為懷抱夢想的過程，不僅拉近農民工與不同社會階層觀眾的距離，也使得情感政治成為夢想敘事中最重要文化表徵：農民工與企業菁英、白領階層觀眾的跨階級相遇成了象徵性的生命經驗轉折，將農民工所遭受的物質性與社會結構性的挑戰與不公，轉化為內在情感經驗的協商與重塑。

三、向上流動失敗與情感經濟

本文接下來將以《城市夢想》第二季第五集《我是你的臂膀》作為農民工夢想敘事結構的分析範例，闡述此敘事文本所蘊含的情感結構如何將農民工從憂鬱的移工轉化為快樂、幸福的逐夢者，更進一步探究農民工作為逐夢者對於國家幸福與經濟發展的寓意。本節著重在農民工向上流動失敗敘事中情緒與情感的展演、置換和轉化；在研究方法上，本節採用阿曼德在〈情感經濟〉（“Affective Economics”）中將情緒與情感視為一種可在不同依附對象之間流動與轉換，以形塑各種群體的社會關係的文化經驗，探討《我是你的臂膀》敘事結構裡如何藉由農民工殷彬與企業菁英蔣錫培相遇的情感經歷，將殷彬從苦難者轉型為逐夢者，並且重新形塑農民工群體與其他經濟階層觀眾的文化情感與社會關係。²⁷本文同時挪用阿曼德在《幸福的承諾》一書中針對英國移民情感的分析，一方面凸顯農民工在中國戶口制度下「移工」身分的情感特殊性，另一方面耙梳、深化農民工夢想敘事的情感結構，探討向上流動所勾勒的美好生活何以成為分化底層勞動群體的凝聚力，而使得農民工的逐夢者身分成為結構性社會改革的阻礙而非助力。²⁸

27 關於「情感經濟」之定義，見Ahmed（2004: 117-120）。

28 美好生活（the good life）在本文中不僅是挪用柏蘭特在《殘酷的樂觀主義》一書中與樂觀主義緊密相聯的情感慾望，更是《城市夢想》拍攝對象對於夢想的定義，《我是你的臂膀》裡的蔣錫培就曾在節目最後總結：「身障人士他們這個群體，他們渴望得到關心、得到關愛、得到幫助。特別是讓他們有尊嚴，特別是讓他們融入這樣的一個新時代，融入到追求未來美好生活的夢想當中。」（陳卓2019/06/02: 56:34-56:50）蔣錫培的說法不僅將追求美好生活定位為農民工個人的生命使命，更將之視為是「一個新時代」的重要使命。

《我是你的臂膀》描繪雙手殘疾的農民工殷彬與遠東控股集團主席蔣錫培的相遇。殷彬的太太因為患有小兒麻痺症不方便行走，無法出外打工，而女兒殷黃妮又患有先天性心臟病和兩耳重度聽障。節目一開始講述住在山西太原的殷彬因為殘疾的關係在求職上遇到許多困難，在「付出常人難以想像的艱辛努力後」（陳卓2019/06/02: 1:21），終於成為有一技之長的藝術玻璃噴雕工，並道出殷彬的夢想是用著他「殘缺的肢體去撐起這個家，也想讓孩子以後的生活過得更好」（*ibid.*: 2:08-2:15）。在以農民工夢想為主軸的敘事結構中，《我是你的臂膀》藉由勾勒農民工殷彬的身世，並以其超越常人的堅持與努力建構了他的逐夢者身分。節目接著介紹化身學徒走近農民工生活的企業菁英蔣錫培，簡述二十七歲的他自農村小廠的創業背景，在經過三十幾年的打拼之後，將位於江蘇宜興的公司發展為全國五百強企業。在蔣錫培變身為農民工學徒前，節目透過他與太太的對話與自述，強調其亦是農民出身，對於吃苦的生活一點也不陌生。他太太在回應他擔心體驗的三天都會吃不飽時說：「我們最苦的時候，不也都是農民出來的嘛，種庄稼也種過，吃苦也吃苦過」（*ibid.*: 5:38-5:43）。蔣錫培也強調「我的基因就是農民，基因就在農村，不管我的身分發生了什麼變化，這個烙印是難以揮去的」（*ibid.*: 7:06-7:14）。現為企業菁英的蔣錫培藉由同是來自農村的農民身分，建立了他和殷彬的相似之處與同理連結。

在殷彬與蔣錫培（化身為裴哥）這段師傅與學徒的三天相處中，蔣錫培先是跟著殷彬學著做玻璃噴雕，體驗這份工作的艱辛；晚上入住殷彬家，進一步瞭解其家庭組成（太太和女兒）以及其所面對的生命挑戰（因為女兒生病而負債過日）。接著，節目聚焦於殷彬失業的困境，殷彬工作的小微企業因為城中村改造需要搬遷，而老闆在工廠搬遷的同時進行生產製造機械化，以電腦取代人工噴雕，使得殷彬面臨遣散的危機。儘管殷彬與蔣錫培試著在商場兜售殷彬在家中工作室自製的噴雕玻璃杯盤，但卻四處碰壁。緊接而來的是面對太太要求清償部分跟娘家大姊借款的爭執，進一步說明了殷彬的生活壓力。蔣錫培也試圖透過中國殘協瞭解是否有協助殷黃妮取得國家項目補貼款項的辦法，以減輕殷彬的債務危機。然而，經過諮詢以後發現黃妮耳朵的先天性畸形，讓她喪失了國家項目補助的資

格，也因此蔣錫培在離去之前，雖然理解到身障農民工群體的困境，但依然無法以其化身的身分提供實質的協助。一個月之後，殷彬受邀前往遠東控股集團總部對其內部的身障員工進行勵志分享會，與蔣錫培重逢，得知其真實身分，並為集團新創的公益機構「山西身障人創業遠東幫扶點」揭牌。蔣錫培同時在分享會後於私人辦公室接待了殷彬一家，並安排其與紫砂專家王錚平見面，商談殷彬以玻璃噴雕技藝創業的未來性。

以《我是你的臂膀》作為《城市夢想》敘事分析的範例，農民工與企業菁英相遇的故事框架和情感結構可以分為兩部分，前半部描繪企業菁英與農民工相處的三天過程，敘事主軸多著重在描繪農民工在城市追求夢想所遭受的挑戰與苦難，而透過農民工個人生命經驗所傳達的情感多為失望、挫敗、無奈與無助，或是伴隨著追逐夢想失敗與失望而來的羞恥、不滿與憤怒。²⁹後半部則聚焦於企業菁英與員工商討協助農民工的具體做法，同時讓農民工暫時離開生活日常，前往企業菁英所在的城市與其重逢，並且簡述農民工在得知「徒弟」的真實身分後所獲得的實質幫助。儘管企業菁英提供的協助通常並不能完全解決個別農民工的困境，但其所贈與的禮物和提供的承諾，卻能一改節目前半部農民工的愁雲慘霧，呈現出驚喜、感動以及充滿希望的氛圍。

在《我是你的臂膀》的前半部敘事中，殷彬三十幾個年頭的生命苦難被濃縮在近五十分鐘的鏡頭敘事裡，他談及自己從小就因身障而沒有玩伴的孤獨感和邊緣化，以及在就業和創業上經歷過無數的失敗，好不容易才學得的玻璃噴雕手藝，卻讓他在城市現代化和工藝機械化時失業了，展現出一種被時代「淘汰」的感覺（ibid.: 38:50）。當其和太太在為了清償部分債務而起爭執時，鏡頭更是多次聚焦於太太手寫的積欠對象與金額數目的帳本，捕捉殷彬因憤怒而摔破送給女兒的玻璃杯，以及殷彬無處發洩怒氣與挫敗感而多次用力踢著屋外的磚牆。在這樣的鏡頭敘事中，殷彬成了

29 《我是你的臂膀》全長共58分13秒，前半部企業菁英體驗農民工生活的部分總長約51分鐘，後半部農民工與企業菁英的重逢約7分鐘；《城市夢想》系列其他集數的前、後半部敘事佔比都和《我是你的臂膀》相同。由敘事長度比例來看，可見《城市夢想》著重於農民工生命經驗的闡述。

「憂鬱的移工」，他的抑鬱不僅來自身障的身分與成長背景，更來自於失敗的向上流動經驗，女兒生病所積欠的債務成了他無法實現提供女兒和家庭更好的生活的承諾的具體表現；失業後兜售杯盤的到處碰壁，更再次重現了他過往的生活經驗，提醒他在經過了許多努力以後，又回到了原點。殷彬在家裡工作室自製的玻璃噴雕杯盤，一直是他「掙錢還債，改善生活的希望」（*ibid.*: 31:46-31:48），對他而言，那些杯盤承載著他向上流動的夢想，是「快樂的物件」（happy object, Ahmed 2010: 135），提供了他幸福的承諾。節目藉由三次特寫一個雕刻著「夢想」以及「給夢想一雙翅膀自由遨翔」等字的杯子，具象化了玻璃噴雕工藝作為殷彬追求美好生活的幸福載體，然而，他的失業與商家以產品設計過時為由而拒絕寄售的行為，讓殷彬再次被時代所遺棄。因此，他在蔣錫培提議找店面做小生意時，沮喪又憤怒地說著：

我現在腦子特別亂，沒有天下掉餡餅的東西，你醒醒吧！好不好？你太單純了。這麼多年我經歷了很多事情，我還是四處碰壁。我堅持了將近二十年了，我還是這樣子，還得淪落到擺地攤。（陳卓2019/06/02: 38:21-38:40）

殷彬話語中繞了一大圈還是回到了原地的「倒退」、「沒有進步」感，不僅總結了其二十多年的生命經驗，更隱含了他過往堅持的生命治理——學得一技之長——在城市現代化和工藝機械化的宏觀背景下，是項「錯誤」的決定，他的勞動和生命經驗因此而陷入無法脫困的危機之中。如果殷彬過去一直堅信著只要靠著自己的雙手和玻璃噴雕技藝就可以提供家庭更好的生活，在被蔣錫培稱之為「我們很有幸、很有緣，贏得了一個好的時代的好的成就」的新世紀（*ibid.*: 2:20-2:26），他卻與這樣的機緣錯身而過，甚或再次意識到他一直活在一種他能贏得幸福的「假象」當中。他對於自己並非具有自由追求夢想的權利的覺醒、不滿與憤怒，展現在他與太太爭吵的過程中，摔碎了他在尚未知道自己即將失業之前送給女兒的那個刻著「寶貝快樂成長」的玻璃杯上。那個玻璃杯一方面具體描繪了殷彬「讓孩子以後的生活過得更好」的夢想，將美好生活從優渥的物質經濟條件拓展到快樂的抽象情感之外，另一方面玻璃杯的碎裂，則體現了殷彬說：「我所做的工藝已經不再做了，已經淘汰了」所帶有的失望與無

奈 (ibid.: 38:47-38:50)，更進一步揭露了殷彬向上流動夢想的破滅。

在殷彬無法向上流動的生命敘事中，除了現代化與城市化的宏觀因素之外，更多的是他自述中作為身障者、農民工被社會大眾排拒的自我羞恥感。透過殷黃妮開玩笑似的提問：「爸爸最怕丟的是什麼？」(ibid.: 19:24)，然後自問自答地說：「丟人」(ibid.: 19:34)，節目敘事聚焦於殷彬逐夢失敗的羞恥感而非憤怒與不平。相對於以摔杯和踢牆等肢體動作來傳達夢想破滅的失望與挫敗，殷彬兩次提到自己覺得「不是一個合格的丈夫，也不是一個稱職的父親」(ibid.: 34:07-34:09)。他自認為在扮演父親與丈夫角色上相當地「失職」，展演的是一種自我否認與羞恥感，而這樣的失敗對他而言，僅能歸咎於無法抗拒的時代因素和自我的無用——其技術與勞動力不再被現代社會所需要——而非國家政策缺乏配套措施與規劃。在殷彬的成長經驗中，追求夢想與美好生活都是個人的責任，如同他克服困難習得一技之長，以此取得經濟獨立、養家活口，或是在別人因為他的身分排斥他時，他學著「盡量把自己變得更加自信一點，更加陽光一點」(ibid.: 4:06-4:12)，都顯示了殷彬認為個人必須完全承擔責任，以獨立與堅毅等人格特質，證明自己擁有追求幸福的權利。雖然營造了蔣錫培口中殷彬「他們用自己的行動證明，身障人是對社會有幫助的，是為社會可以做出貢獻的」大眾形象 (ibid.: 49:47-49:55)，然而，節目敘事聚焦於殷彬的「失職」與羞恥，進一步迴避了他探問社會結構性缺失的可能性，將逐夢受挫的失望情緒完全導向個人的失敗，以內斂的羞恥感取代了外顯的憤怒，將農民工殷彬與企業菁英蔣錫培的相遇，轉換成一種農民工內在情感的「傾訴」與企業菁英體驗者的「傾聽」。³⁰傾訴與傾聽看似讓農民工有了發言權，但卻將這樣的發言內容限縮於自我的失敗與羞恥，使得傾聽

30 節目兩次提到社會大眾與身障農民工的連結有賴「傾聽」。一次是在蔣錫培的三天體驗後心得分享獨白中提到，他說：「其實我們還是要更多地去連接，更多地去傾聽，更多地去有地放矢，使他們得到基本的幫助，使他們對未來更有信念，更有信心。」(陳卓2019/06/02: 49:56-50:10) 另一次是蔣錫培的員工提出如何協助身障農民工的方法：「讓這些身障人士，他們有一個展現的舞台，讓我們去傾聽一些，他們背後的故事。」(ibid.: 52:14-52:17) 殷彬自己在總結與蔣錫培的相處經驗時，也提到：「[蔣錫培]能夠和我說說心裡話」(ibid.: 48:39)。

成爲一種窺探農民工內在情感世界的途徑，而非深入瞭解身障農民工需求的重要過程。殷彬的言說翻轉了屬於私人領域的羞恥感，使之外露而成爲一種社會大眾可感知的文化情感，將農民工向上流動的失敗，描繪爲個人的因緣際遇而非群體社會的責任。

然而，在農民工的夢想敘事中，傾訴失敗雖然闡述了他們作爲中國夢裡不快樂主體的生命經驗，卻同時也證明了他們是具備追求美好生活條件的未來小康階層。如同多數評論家指出，《城市夢想》所拍攝的農民工都具備純樸、積極和不畏艱難等正向人格特質，殷彬正是透過回顧其過往生命經驗的失敗與面對挫折的積極態度，來展現他在追求幸福與向上流動機會的堅忍不拔，更說明了他個人堅信獨立自主是實現夢想不可或缺的人格特質與生命治理觀。³¹殷彬的「傾訴」成爲一種展現逐夢者身分的自我表演，唯有在經歷過多次的失敗之後還能在追求夢想的道路上奮力不懈而不怨天尤人，才得以證明農民工並非爲時代所淘汰與遺忘的失敗群體，而是與城市居民一樣，可以透過個人奮鬥而晉升白領階層的現代主體。也正是藉由傾聽農民工向上流動的艱辛和失敗，企業菁英的體驗者和白領階層觀眾得以認可與賦予農民工追求美好生活與幸福的願景，將農民工從中國夢的「他者」轉化爲自我群體的一部份。節目以農民工內在情感的表述，特別是含蓄的自我羞恥感而非不滿與憤怒，將農民工失敗的生命治理，重新形塑爲追求當代中國夢所需的個人人格特質——獨立自主與堅忍不拔。因此，農民工的苦難經歷在《城市夢想》的逐夢敘事結構中僅扮演著次要的角色，關鍵在於透過苦難的情感敘事，展現農民工的人格特質，以其可塑性與未來性，取代過去的失敗，重新賦予他們幸福的生命願景。

在《城市夢想》裡，農民工與企業菁英的相遇，雖然是一種跨階層的社會關係，但並非是超越階層的平等關係。在以傾訴和傾聽作爲重新闡述與形塑農民工人格特質的敘事結構中，除了必須將農民工向上流動失敗的經驗，轉換爲堅毅的個人奮鬥史，讓觀眾得以從中觀察並肯定農民工的

³¹ 在殷彬參加《城市夢想》的錄影之前，山西的新聞媒體也曾報導過他，強調的正是他獨立自主的性格與生活態度，見《每日頭條》（2014/08/21）。

正向人格特質之外，更進一步是要確保農民工不為失敗的負面情緒（如憤怒、不滿與憂鬱等）困住。在《城市夢想》中，將農民工帶出向上流動失敗陰影的任務，不僅是企業菁英傾聽農民工聲音的目的，更是農民工需要積極展現的人格特質。《我是你的臂膀》在結束前半部鋪陳與講述殷彬的個人奮鬥史與困境之前，穿插了一段殷彬對於和蔣錫培（化身為裴哥）相遇的總結，他說：

裴哥他是一個特別有愛心的人，本身我就是被很多的關注，或是被很多人的關愛，在這樣的環境中成長起來的，所以我內心裡面也是和裴哥一樣有著一顆善良的心。這一點我倆是特別像的。
（陳卓2019/06/02: 46:54-46:15）

在殷彬與蔣錫培的相處中，他除了感受到對方的善心之外，更表達他對於這段相遇以及其過往人生經歷所抱持的感恩心情。³²殷彬以感恩的心，置換了奮鬥失敗過程中的憂鬱與不平，讓相遇故事的前半部以相互感受到對方的心意和同理對方的處境作結，將這場跨階層的生活體驗成為農民工內在情感的重要轉折，以感恩的情緒作為勞動階層與中／上階層的新文化情感，置換農民工生命奮鬥史的抑鬱與不滿。感恩的心不僅成為農民工標示自身非中國經濟發展夢想當中的「他者」或「異類」的重要人格特質，更是跨階層相遇企圖形塑的新社會關係。如同節目在蔣錫培拿著殷彬的噴雕玻璃品到處兜售時，鏡頭曾特寫雕刻著「感恩」和「福」字的兩個杯盤，指涉農民工殷彬對於協助其尋找買家的蔣錫培和購入其工藝作品買家的感謝，以及殷彬企圖藉由噴雕玻璃尋求幸福的寄望。感恩之情成為農民工與企業菁英相遇敘事結構裡主要的文化情感與社會關係。農民工要取得向上流動的幸福承諾與城市公民身分的未來，端視其是否能放下心中的怨憤，以善意和諒解來轉化城市／鄉村公民在向上奮鬥發展史上的物質性與歷史差異。

《城市夢想》以感恩的心作為重新形塑農民工形象的人格特質和文化情感，遮蔽了跨階層交流的矛盾與衝突，同時也置換了農民工在國家經濟

32 在體驗結束時，殷彬做了一個噴雕玻璃杯給蔣錫培，感念共同相處的時光。

發展中所受到的不平等對待與資本的剝削等負面情緒。³³《我是你的臂膀》在描繪殷彬與蔣錫培對於面對失業困境的衝突時，僅停留在當裴哥提議開店創業之後，殷彬大聲、憤怒地對裴哥說：「有些東西你不瞭解」（ibid.: 38:13）；裴哥所不明白的是殷彬過去二十幾年充滿失敗的人生經驗。這不僅顯示了兩個人在發展史上的差異，更凸顯了這兩個階層長久以來的誤解與誤讀。蔣錫培在節目一開始就強調自我身上的農民基因與吃苦經驗，自認他與殷彬的出身背景相同，能夠讓他們有某種生命的共鳴，但是在體驗三天即將結束之際，殷彬隨即道出他們兩人在發展經驗上的巨大差異：雖然蔣錫培在創業過程中雇用了相當多的身障農民工，然而他之所以能夠從農民創業者走上企業菁英的發展之路，便是建立在利用農民工勞動的剩餘價值之上。相較於蔣錫培的成功發展史，殷彬二十幾年來的創業、勞動以及在玻璃噴雕中小企業的工作經驗，恰巧是其個人勞動力被「剝削」以及他被中國經濟發展排除的生命史。但是如同郭春林（2016: 67）在闡述新工人（農民工）參與中國實境夢想秀的研究中所主張的，在當代文化媒體的農民工再現中，剝削以及其所顯露的「怨氣」必須是隱而不見、不能被提及的議題；同時，文化再現以感恩取代了剝削所帶有的階級矛盾與衝突。³⁴因此，殷彬收斂了自己面對蔣錫培過於天真的憤怒，轉為以感謝熱心、善良的裴哥的態度作為這段短暫師徒關係的總結，並且希望不要讓不愉快的談話影響了他們的關係。儘管節目聚焦於兩人對於未來規劃與想像的衝突，凸顯了彼此在勞動階層與生命經驗上的差異，但感恩的話語卻置換了殷彬的憤怒與不滿，以相互和解、體諒的跨階層交流取代不平等的雇傭關係，重新勾勒企業菁英與農民工的社會關係。不同於郭春林研究提及新工人在《中國夢想秀》中將感恩之情獻給父母的親情論述，《城市夢想》

33 社會學家潘毅、盧暉臨和張慧鵬（2010: 161）在《大工地上中國農民工之歌》一書中指出「極端惡劣的工作和生活條件，沒有尊嚴的做人體驗」，使得「『恨』」成為建築工人普遍的「情感體驗」，他們「恨老闆太黑心，不把工人當人看；恨有的政府官員不關心老百姓疾苦；恨沒有好的爹娘，不能出生在城市；恨自己沒有好好讀書，落到賣苦力的下場……」。相較於社會學者們在建築工地上所觀察到以「恨」為中心的農民工情感，《城市夢想》的夢想敘事結構以感恩的情緒置換了跨階層的社會關係。

34 關於當代媒體如何以感恩取代剝削的話語，見郭春林（2016: 64-68）。

將農民工的感恩之情描繪為感謝家庭的支持、社會菁英的熱心相助，以及感恩社會大眾的文化情感。在殷彬憂鬱時，蔣錫培提醒他要慶幸自己有個乖巧的女兒，要變得快樂一些；殷彬在述說自己的「失職」時，也感謝太太和女兒陪著他吃苦；他更在總結與蔣錫培的相遇時，提到自己過往也是「被很多的關注，或是被很多人的關愛，在這樣的環境中成長起來的」（陳卓2019: 46:58-46:06）。在感謝那些曾經在他生命困頓時幫助過他的人，殷彬隨之將感恩的對象擴大化以及抽象化。感恩成為農民工群體與社會大眾兩者之間新的文化情感：以體諒和同理，取代跨階層以及城市／非城市公民群體之間，複雜且矛盾的對立與共生關係。

在《城市夢想》中，感恩之情一方面重新形塑農民工與社會大眾的社會關係，另一方面也改寫了農民工向上流動失敗的內在情感結構：節目敘事以正向情緒取代了殷彬被社會與時代所淘汰的那股無奈與怨氣，終結了殷彬二十幾年向上流動失敗的憂鬱生命敘事，轉向重新擁抱夢想的未來性。殷彬在得知蔣錫培的真實身分後說道：「只有在電視裡面、電影裡面，我才能看到這樣場景，這樣的奇蹟，或者這樣發生的一些故事，不可能在我身上發生的。」（ibid.: 54:16-54:24）殷彬以「奇蹟」來描繪他與蔣錫培的相遇，說明了這樣跨階層的相遇是多麼的難能可貴與不真實，而展現了他的感恩之情；同時，「奇蹟」揭示了跨階層交流的社會功能——將殷彬帶出過往失敗的經驗與憂鬱情感，轉向擁抱夢想的幸福承諾。節目在殷彬說完上述的驚喜與感恩之情後，隨即聚焦於蔣錫培展示他在工作體驗時與殷彬一起雕刻兩塊玻璃，上面正刻著「福」字。透過鏡頭對於「福」字噴雕玻璃的特寫，節目將那兩塊原本被老闆稱為連三級品都排不上的「失敗品」，轉變為殷彬與蔣錫培奇蹟般相遇的象徵物：「福」字一來代表了殷彬對於與蔣錫培這段相遇的經驗與感受——福氣，一來也指涉了這段相遇，如何重新改寫了他過往向上流動失敗的情感轉折：從失望、沮喪和憂鬱，轉換為重新迎接幸福。

對殷彬而言，要重新擁抱幸福的承諾，相信自己擁有自由追求快樂的權利，很重要的環節就在於要放下一種被困在原地、無法前進的憂鬱。這

份憂鬱的情感來自於他生命中所有無法向上流動的失敗，而在節目中具體的呈現就是他說自己的手工藝已經被社會淘汰了。被淘汰的感受，說明了殷彬已經否定了自我的社會存在，而無法工作也就導致他無法給予家庭更好的生活，更進一步否定了他個人存在的意義，使他陷入了一種被困住的憂鬱，一如蔣錫培對他的擔心：「如果你是這樣想的話，你會走不出來的。」（ibid.: 38:54-38:56）在《城市夢想》的敘事結構中，殷彬的憂鬱成爲一種展演，因爲唯有透過情緒低潮的鋪陳，才能具體展現農民工過往的痛苦與磨難，何以成爲蛻變的前奏，並且更進一步以內在情感的膠著，替代實際的生活困境，讓農民工的社會問題成爲情感轉換的問題：只要能調整自我的情緒，就能化解危機。因此，當蔣錫培以殷黃妮乖巧的存在，來鼓勵殷彬要爲現實與家人提起精神時，他已經非常巧妙地將殷彬向上流動失敗所影射的個人與社會之間的緊張關係，轉化爲家人之間美好的親密關係，並且以感恩的情緒置換殷彬的怨氣與憂鬱，改寫了他向上流動失敗的內在情感與文化意義，重新將充滿負債壓力與情緒衝突的家庭空間與親密關係，轉換爲農民工追求向上流動和幸福承諾的穩定力量，甚至是美好生活的最終定義。

《城市夢想》所勾勒的農民工夢想敘事，不僅扭轉了向上社會流動與幸福承諾的社會性與公眾性，將之形塑爲私密化的個體生命敘事，轉向個人內在情感的調適與尋求家庭關係的和諧，更進一步將農民工情感工程的改造，描繪爲優於物資與實質的協助，抽空了美好生活與幸福承諾的具體性（物質生活），強調精神層面上的提升與超脫。不同於郭春林所探討的《中國夢想秀》著重在節目實質化農民工夢想的內涵，比方說上台表演爲皮村工友活動中心爭取一套音響，《城市夢想》削落化了物質資助的具體形式，著重於再次給予農民工群體幸福的承諾，肯定其與城市居民同樣享有平等的公民權，重新修補與形塑農民工與大眾群體、國家組織間的社會關係。

在殷彬與蔣錫培的再次相遇裡，節目雖然有提到蔣錫培因爲這段體驗而設立了「山西身障人創業遠東幫扶點」慈善機構，專職協助身障農民

工，但卻沒有直接給予殷彬經濟上的資助，而僅透過紫砂專家提供他創業的點子。³⁵就實質的幫助而言，蔣錫培只給了殷黃妮一副新的人工耳蝸，然而，殷黃妮的回應是「新耳蝸，給我新耳蝸幹啥呀。」（ibid.: 55:07-55:10）她的回應顯示了她對於其個人與家庭所面對的「問題」，與蔣錫培有著不同的詮釋。對於殷黃妮來說，目前家中最急迫的問題是父親的失業與因為她的疾病所積欠的債務；一副新的人工耳蝸雖然能承諾將來她能如「正常人」一般繼續生活、求學以及工作，但卻無法解決當下的問題。然而對於蔣錫培來說，這副備用的耳蝸，卻是殷彬與殷黃妮兩代人幸福與美好生活的未來承諾，因為只有殷黃妮能夠繼續求學，這個家才有向上流動的可能性（或是至少不向下流動）。³⁶殷黃妮與蔣錫培對於備用耳蝸的不同回應，不僅說明了這場跨階層、跨世代相遇之間的錯位與誤解，兩者對於農民工問題與解決方法的不同詮釋，更進一步闡述了《城市夢想》農民工的夢想敘事結構，著重在幸福與美好生活的承諾而非夢想成真，亦即透過夢想的敘事結構，重新賦予農民工向上流動的幻想。夢想的未來時間軸，一方面將農民工拉回向上流動的生命發展軌跡；另一方面，也讓這場跨階層的交流帶有更多的不確定性：農民工與企業菁英的相遇，可能僅成為情感與精神上的轉換與提升，而農民工的生命軌跡仍在原地打轉。

儘管《城市夢想》的農民工夢想敘事結構，無法直接解決農民工群體所遭遇的實質問題，然而農民工與企業菁英的相遇，旨在藉由農民工內在情感的展演、協商與重塑的過程，重新拉近與形塑個人生命經歷與國家發

35 在網頁資訊查詢中，並沒有找到蔣錫培對殷彬的後續協助，但有報導指出殷彬參與遠東控股集團在2019年7月28日到31日舉辦的「見證生命奇蹟，追求心靈圓滿」未來之星身障人士學習會，可見兩者在節目結束之後的後續互動，與遠東控股集團董事長蔣錫培對身障人士福利的持續關切與心力投注；報導見：《壹讀》（2019/08/16）。關於遠東控股集團對於身障人士關注的歷史，見張瑤（2020/06/23）。

36 殷黃妮在節目中朗誦了自己寫的一首短詩〈我是你的臂膀〉，在這首短詩中，她傳達了希望父親能夠一直伴著她追隨夢想的願望：「你是我的臂膀，抱著我慢慢長大／我是你永遠的女兒，有了你，我才有了健康的生命，更好的生活／親愛的爸爸，你辛苦了，我好希望，你可以一直牽著我的手，我們一起放飛美麗的梦想。」（陳卓2019/06/02: 41:31-42:00）從這幾詩句中，可以窺見殷黃妮如何挪用美好生活與幸福承諾作為個人夢想與生命發展敘事的主軸。

展敘事之間的差異與連結。³⁷在殷彬赴江蘇宜興與蔣錫培的員工（大多為身障工作者）分享自我生命歷程後，主持人以「艱難、艱苦、艱鉅」總結了殷彬的演講（*ibid.*: 53:18-53:20），接下來敘事就聚焦於揭露蔣錫培的真實身分與其身分帶來的未來承諾，並且在節目結束前，介紹蔣錫培所設立的新公益機構提供的服務範圍及服務對象，將原本單獨賦予殷彬的幸福承諾與美好生活，擴展到其他與殷彬擁有相似經歷與磨難的農民工、身障者，進一步將資本發展與國家經濟建設所勾勒的美好願景，推及原本被視為社會底層與弱勢的群體。

向上流動在《城市夢想》的敘事結構中，不僅是驅動農民工遷移勞動尋求美好生活的慾望，更是形塑與連結農民工與社會、國家的一種社會關係——農民工所追求的城市公民身分與社會歸屬感，從實質的獲取與享有，成為柏蘭特所言之「情感狀態」（*an affective state*, Berlant 2011: 163）。農民工與企業菁英的相遇所創造的新局是重新打造農民工的內在情感，讓他們將自我的勞動與生命，重新投注於向上社會流動的幻想；儘管這個幻想本身正是讓他們過去吃盡苦頭的主因，但因為唯有相信與投入向上流動幻想，才能讓農民工揚棄底層苦難敘事中的「他者」身分，而與新興白領階層一樣享有某種社會歸屬感，城市公民身分因此成了一種「情感狀態」。如同柏蘭特強調跨國移民者對於向上流動的想望，不能僅被單純視為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而是蘊含勞動底層在面對日常生活的危機與狀況時，所創造出來的多元應對措施與複雜情感經驗，《城市夢想》以農民工與企業菁英相遇所發展出來的向上流動（夢想）敘事，闡述了農民工與中國經濟發展相映而生的情感經歷，說明這個群體如何從抑鬱的疏離者，轉變為對社會大眾與國家抱持著感恩心情的參與者，並且進一步改寫了農民工成長敘事（*bildungsroman*）中個人與社會、國家的關係，扭轉農民工對社會歧視、發展不平等的怒氣，修補農民工與其他社會階層的矛盾與衝

37 暫時的替代性方案包括：讓在城市工作多年的農民工回鄉探望留守老人與孩童、為留守孩童提供線上外語課程、為希望挽回母親聽力的農民工提供全面性的檢查、為農民工孩子提供線上外語課程與才藝課程讓他們能夠取得其他人生發展機會，藉此擺脫階級複製的危機。

突，將農民工的個人發展重新納入國家發展論述與願景之中。³⁸

在強調農民工群體所寄望的幸福與美好生活就在不遠的未來的前提下，《城市夢想》所蘊含的情感政治，雖然重新將農民工的生命敘事整合併入國家經濟發展的規劃，修補農民工群體與其他社會階層和國家之間的矛盾與斷裂，但農民工充滿苦難的過去與現在，確實見證了改革開放所承諾的向上流動與幸福，對於底層群體而言是多麼地空洞與遙不可及。《城市夢想》以逐夢者重新打造農民工身分與情感內涵，重新定位與拉攏農民工群體和其他階層群體與國家之間的關係，與央視財經頻道作為國家社會政策與經濟發展宣導的工具密不可分，然而節目以農民工過往向上流動失敗的生命經驗，作為個人內在情感重述與重塑的切入視角，正說明了農民工在改革開放後生命治理的危機與複雜性。在面對經濟發展所承諾的向上流動成爲一種遙不可及的幻想之際，農民工寄望以整頓自我內在與家庭關係，重新將向上流動形塑爲身體勞動與生命治理的動機與目標，再次強化了向上流動作為底層中國夢的（不）可能性：在當前以廉價勞動力取得優勢的國家經濟發展模式與全球分工階序中，資本與新自由主義經濟已經無法賦予勞動階層其所承諾的美好生活，向上流動僅是底層得以在艱困生活中繼續堅持下去的「殘酷的樂觀主義」。³⁹

儘管《城市夢想》的農民工敘事企圖將中國夢所承諾的向上流動與經濟發展，普及到勞動底層群體，然而節目挪用農民工苦難敘事文類的情感結構，以向上流動失敗的重述與再現，作為農民工整頓內在情感的主要轉折點，在殘酷地重新建構向上流動迷思的同時，也賦予了農民工群體「社會哀悼」（social mourning, Berlant 2011: 187）的機會。柏蘭特在談「社會哀悼」的概念時引用社會人類學家華康德（Loïc Wacquant）的研究論文〈在「區內」：美國貧民窟裡騙子的社會藝術〉（“Inside ‘the Zone’ : The Social Art of the Hustlers in the American Ghetto”）。華康德（1993:

38 對於移民向上流動幻想複雜性的闡述，見Berlant（2011: 161-189）。對於個人成長敘事文體中所蘊含的個人與社會、國家關係，見Slaughter（2007: 86-139）。

39 關於中國經濟的國際競爭力與廉價勞動力，見溫鐵軍（2005: 67-69）。

156) 將其採訪對象瑞奇 (Rickey) 深陷貧窮的生活處境描繪為一種「僅能不斷投注在那些不切實際的自我欺瞞的勞動中，才能勉強存活下去的生存狀態，而這樣的處境，可說是一種不言而喻的『社會哀悼的勞動』 (the labor of social mourning)」。柏蘭特在引用「社會哀悼的勞動」時將之 and 同性戀並置，主張在維持社會常態與常規的運作下，貧窮主體與同性戀者要為主流社會包容所做之犧牲與哀悼都必須被遮蔽，也因此，在柏蘭特和華康德的文本語境中，社會哀悼指的是貧窮主體與移民群體所失去的向上社會流動機會，而在維持社會正常運作之下，向上流動僅是一種幻想的事實是不可言說，必須避而不談或是被遮蔽。然而，在《城市夢想》的節目敘事中，每集的主角必定會訴說向上社會流動失敗的過往，這樣的失敗敘事，成了揭露個別主體的社會哀悼過程，讓其所失去、不可得的向上社會流動的經驗與憂鬱情緒成為一種公開的述說與展演。殷彬在堅持、奮鬥了二十多年，最終仍淪落到需靠擺地攤維生所展現的憤怒、失望與抑鬱情緒，不僅是揭穿了向上流動對於身障農民工而言僅是幻想的事實，更短暫地將哀悼的憂鬱情緒渲染擴大為對其過去、現在與未來的生存狀態。也正因為意識到憂鬱與哀悼對於維持個體和社會正常運作的威脅，蔣錫培試圖勸導殷彬不該陷入憂鬱。《城市夢想》一方面在敘事上賦予觀眾短暫窺見農民工的生命勞動僅是一種「自我欺瞞」的向上流動 (ibid.: 156)。另一方面節目在剪輯上以時間的懸置讓哀悼成為觀眾暫時性的共感經驗：在農民工與企業菁英再次重逢前 (約一個月的時間)，農民工無法向上流動的憂鬱與「社會哀悼的勞動」處於懸而未決的狀態 (ibid.: 156)。在農民工描繪過去向上流動失敗的經歷時，其所遭遇的磨難與考驗，包括：留守老人、留守兒童、感情、家庭親情以及身體健康 / 障礙等，都成為其在追逐向上流動機會時所喪失的有形 / 無形之物，將原本個人的損失置換為群體的失落，使得農民工向上流動失敗的講述成為一種社會哀悼，讓白領階層觀眾藉由情緒與情感的見證與體驗 (農民工的眼淚、身心的病痛以及家庭、社會關係的疏離)，感受農民工過去追逐發展夢中所付出的代價。然而，這個哀悼的過程，迅速地被農民工與企業家重逢的「驚喜」與「奇蹟」置換，農民工的生命歷程又進入擁抱夢想的社會「正軌」。不僅讓我

們看到過去與當下勞動底層與中國夢脆危的社會關係，更體現了以向上流動為夢想核心的當代樂觀主義是多麼地殘酷：當農民工以為個人與家庭帶來更美好的生活作為勞動遷移的夢想時，他們其實更遠離了原本其所追求的幸福。⁴⁰

四、中國夢的再生產

在《城市夢想》的敘事結構中，跨階層相遇在重塑農民工內在情感結構，以及個人、社會與國家關係之間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農民工與企業菁英的傾訴與傾聽，不僅展演了農民工自我的情感改造工程，將痛苦轉化為蛻變與人格養成的必經歷程，農民工與企業菁英在三天體驗中所積累的情感依附，更進一步中介農民工、白領階層觀眾與國家之間的社會關係，重新協商農民工作為中國社會「內部他者」身分所引發的焦慮、不滿與憂鬱，以讓底層群體再次擁抱夢想（向上流動幻想）作為農民工的社會參與與實踐，賦予此群體所尋求的社會歸屬感。

企業菁英的中介性，一方面重新賦予農民工向上流動的幻想，讓農民工的逐夢者身分陷入一種帶有階級差異的「殘酷的樂觀主義」，另一方面揭露了農民工群體過往深陷無法向上流動的現實，以及其所耗費在追求向上流動的精力與（有形與無形的）損失。《城市夢想》聚焦於農民工逐夢的過程而非美夢成真的時刻，特別以戲劇化的方式，描繪農民工與企業菁英的相遇如何成為向上流動失敗敘事的轉捩點，強調農民工在生命最低潮與困頓的時候，將自己的脆弱與絕望交託在陌生的外來者面前所帶來的強而有力的回應，讓觀眾得以慈善家的視角來定位參與體驗的企業菁英，並期待他們的參與和介入，能夠修補與拯救農民工對社會大眾與經濟發展的失望，進一步使農民工相信若自己堅持不懈還是能夠取得向上流動的機

⁴⁰ 節目中有許多農民工因為急於累積辛苦賺來的財富，而需要在過年值班賺加班費，無法回家與家人團聚，亦或是在父母生病或是想念留在家鄉的孩子時，都因為往返車費過於昂貴，而不得不放棄返家探望的念頭。農民工要帶給家庭美好生活的夢想成為一種僅限於物質條件與經濟發展層面的願景，而不得不捨棄親情與情感層面的連結與維繫，舒適、漂亮的房子取代了家庭原有的情感功能。

會。而這兩者的相遇卻在《城市夢想》中喬裝為短暫的「師徒關係」。羅賓斯（Bruce Robbins）在其專書《向上流動與公共福利》（*Upward Mobility and the Common Good*, 2007）研究文學與公眾利益的形成與想像時，發現英美文學中的向上流動敘事雖然是建立在資本主義個體的自我奮鬥與個人利益之上，但在極度強調個人主義的敘事邏輯裡，卻也提供了公眾利益和社會福利國家制度的想像與發展空間。他主張在大眾文化的向上流動敘事裡，故事主角與其心靈導師間的學徒關係，比方說電影《沈默的羔羊》（*The Silence of the Lambs*, 1991）裡警校剛畢業的女警探與提供破案線索的重犯，或是《心靈捕手》（*Good Will Hunting*, 1997）中聰明卻叛逆不羈的清潔工主角與哈佛大學數學系教授間的師徒關係，都說明了在個人向上攀爬的同時，也存在著提供機會和輔助的無私贊助者，而正是這不求回報的上下扶持關係，使得這些充滿資本主義個人色彩的社會流動敘事，也為建立公眾利益的可能性做了鋪陳。⁴¹羅賓斯（2007: xiv）研究中的個人階級流動和公眾利益並非處於對立發展的狀態，而是一種相輔相成的關係，他主張閱讀這些階層流動的敘事，「也許是迂迴的教導我們不需要獨立自主和自私自利，雖然這和一般看法有所不同。這些向上流動的故事或許是要教我們學會思考公眾利益。」在羅賓斯的研究中，個人向上流動敘事中主角與贊助者、導師和提攜者間的依賴、扶持關係，正是現代福利國家思想的起源（*ibid.*: 235）。《城市夢想》的跨階層相遇在某種程度上，近似羅賓斯向上流動敘事與公眾福利研究中無私的師徒關係，然而，節目翻轉了企業菁英與農民工本有的權力位置與關係，在三天的體驗生活中，將喬裝企業菁英置放於農民工的工作指導與關照之下，凸顯了農民工在其相對弱勢的環境中，仍擁有賦予別人照顧與溫暖的能力與情感空間，將農民工勾勒為在困境中依然展現人性光輝與擁抱生命的自助者；而在揭露企業菁英真實身分並且提出具體協助農民工計畫時，則扭轉了企業菁英徒弟角色的弱勢地位，讓其提供給農民工的協助成爲一種超乎預期的回饋（以及其伴隨而來的感恩之情），強調農民工的獨立自主與奮鬥才是成功的關鍵，得先

⁴¹ 《城市夢想》的「師徒關係」設定與兩部電影不同之處在於有資源與權力成就向上流動腳本的一方是企業菁英所喬裝的徒弟，而非農民工的「師父」角色。

自助才有可能獲得天助。⁴²《城市夢想》裡短暫的跨階層「師徒關係」成就的是企業菁英的慈善形象，雖然指涉了創造公眾利益的文化想像，卻是建立在農民工的自我內耗。

因此，跨階層相遇的敘事結構，成為樂觀主義的生產與再生產的文化機制，讓向上流動所帶來的幸福承諾與美好生活，成為農民工能夠繼續在看似毫無希望、日復一日毫無進展的日常中，繼續投注勞動力的生命治理技藝。⁴³在《城市夢想》中跨階層相遇的誤讀（擁有相似吃苦的經驗或是同是農民的背景）與情感效應（感恩），正說明了節目的敘事架構是建立在企業菁英最終以慈善家的身分介入，來成就農民工自身與白領階級觀眾兩者對於農民工群體能夠取得向上流動機會所代表的樂觀主義，而其殘酷之處，一方面源於慈善家所建立的中國百強公司正是立基於挪用農民工勞動的剩餘價值，另一方面則是以感恩作為主要文化情感所帶來的新社會關係，不僅讓向上流動幻想成為農民工唯一的社會參與方式，也再次遮蔽了憂鬱與不滿之情所隱射的社會不公義，剝奪了農民工想像社會變革的可能性。

《城市夢想》所蘊含的社會哀悼敘事成為有別於感恩的文化情感結構，挑戰了感恩之情所帶有的人文慈善關懷，而以展演向上流動敘事如何剝奪農民工群體資本雇傭關係之外的各種社會關係與家庭親密性，揭示了中國夢裡底層向上流動的（不）可能性。如果感恩的文化情感目的在於「訓練觀眾習慣於相信樂觀主義」（Berlant 2011: 178），以企業慈善家的介入與中介，成就農民工向上流動的近似性與未來性，讓觀眾在聆聽農民工向上流動失敗的苦難時，得以節目的敘事結構來安慰自己，告訴自己農民工的磨難與痛苦終究會得到善意的回應與回報，而不需對於農民工所遭受的不平等待遇過於憤怒的話，那麼農民工殷彬以「奇蹟」來形容自己與

42 企業菁英所提供之協助非一般節目觀眾所能賦予的，比方說在殷彬的例子裡，蔣錫培創立了照顧身障農民工的基金會；因此，社會大眾在觀看《城市夢想》時較難想像自我成為參與改造農民工群體福利的主體。

43 本文認為《城市夢想》具體將抽象的夢想與中國夢概念，視為農民工生命治理的動力與動機。秦昕和徐敏亞（2013）曾就商業模式來分析企業如何將夢想經營帶入新生代農民工的自我生涯管理，並且指出新生代農民工需要積極以商業模式來管理夢想。

慈善家蔣錫培的相遇，就點出了以感恩所形塑的新社會階層關係是多麼地令人「不可思議」與「非常態」，揭露了感恩文化情感所建構的「殘酷的樂觀主義」，並且挑戰了社會階層和諧的穩定性，讓白領階層觀眾得以重新檢視農民工作為「逐夢者」新身分的失落與殘酷。

以「逐夢者」重新塑造農民工的文化形象看似積極、正面，卻是再次將勞動底層推向中國發展夢的邊緣。《城市夢想》的農民工夢想敘事以勤奮、自律、樸實、獨立自主等人格特質與美德，作為審核農民工是否具備追求美好生活的條件，將向上社會流動的基礎與成本完全轉嫁到個人身上，使得私人化成為後社會主義中國時期農民工生命治理的主要準則。⁴⁴節目聚焦於農民工性格與生命經歷的鋪陳與重塑，使之成為能夠擁抱中國夢的主體，敘事強調農民工個人必須放下過往失敗的向上社會流動經驗，以農民工情緒和情感的轉變，置換了實質的經濟發展，將拋開憂鬱視為重新改寫失敗經驗的重要轉折，以樂觀、積極的正面情感重新定義農民工的生命敘事。也就是說《城市夢想》的敘事結構，看似拋棄底層敘事的苦難，但實際上卻是藉由窺探、傾聽與翻轉農民工內在痛苦的情感，展演與重述勞動個體與中國夢的關係，使得勞動底層的中國夢依然是建立在個人生命治理與內在情感的妥協與重塑，而非結構性的改革。因此，《城市夢想》的敘事結構正顯現了新自由主義在底層勞動群體所進行的情感改造工程，以內在情感的重塑來建立社會大眾對於農民工的新身分認同與文化想像，再度將農民工群體納入向上社會流動的中國夢，卻同時又因為喪失了集體變革的可能性，使得農民工更進一步遠離了中國夢所承諾的美好生活。

⁴⁴ 本文認為《城市夢想》所勾勒的農民工的私人化傾向，不僅強調新自由主義發展下的私有化，國家保障機制與社會福利的退場之外，也包含周永康和王荊川（2020: 24）所探討的「個體化」。周永康和王荊川指出農民工的「個體化」可分為兩個層面來談，一個是生命軌跡已經脫離了宗族式的引導和協助，轉為以核心家庭和個人發展作為出外打拼的主要動機，個人必須承擔所有的責任；而另一個層面的個體化是農民工多以「主動學習」和「獨善其身」（亦即不輕易相信他人，也不隨便向人求助）。《城市夢想》的農民工主角皆以核心家庭和個人作為個人奮鬥的動力，節目也傾向於將農民工勾勒為獨立自主的逐夢者。

引用書目

一、中文書目

- 〈作者不詳〉(Anonymous)。2007。〈「80」後農民工：夢想的力量足以改變我們的未來〉“‘80’ hou nongmingong: mengxiang de liliang zuyi gaibian women de weilai” [Rural Migrant Workers Born after the 1980s: The Power of Dream can Change Our Future]，〈《華夏星火》Huaxia xinghuo [Cathaysia Spark] 2: 68。〉
- 〈作者不詳〉(Anonymous)。2014/08/21。〈殷彬用殘疾雙手雕出生命之歌〉“Yin Bin yong canji shuangshou diaochu shengmingzhige” [Yin Bin Uses His Disabled Hands to Create the Song of Life]，〈《每日頭條》Meiri toutiao [kknews]。Retrieved from: <https://kknews.cc/zh-tw/education/y84jm8k.html> on Dec. 18, 2022.〉
- 〈作者不詳〉(Anonymous)。2019/08/16。〈遠東控股集團董事局主席蔣錫培在致良知四合院學習會上的分享〉“Yuangong konggu jituan dongshiju zhuxi Jiang Xi-Pei zai zhiliangzhi siheyuan xuexihui shang de fenxiang” [Far East Holding Group Chair, Jiang Xi-Pei, Shares on Zhiliangzhi Siheyuan Event]，〈《壹讀》Yidu [Yi Du]。Retrieved from: <https://read01.com/zh-mo/8a6QzBQ.html#.Ym9r1vNBwQI> on Jan. 18, 2022.〉
- 王平 (Wang, Ping)。2018。〈農民工社會融合問題的影像呈現——解析央視紀實節目《城市夢想》〉“Nongmingong shehui ronghe wenti de yingxiang chengxian - jixi yangshi jishi jiemu chengshi mengxiang” [The Visual Representation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Social Integration: An Analysis of CCTV’ s Reality Show, My City Dream]，〈《新聞傳播》Xingwen chuanbo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11: 28-30。〉
- 王暉 (Wang, Hui)。2018。〈獨特的農民工群體影像誌——評央視系列紀實節目《城市夢想》〉“Dute de nongmingong qunti yingxiangzhi - ping yangshi xilie jishi jiemu chengshi mengxiang” [Individualistic Rural Migrant Workers’ Visual Image - A Critique of CCTV’ s Reality Series, My City Dream]，〈《中國電視》Zhongguo dianshi [China Television] 1: 30-34。〉
- 王瓊 (Wang, Qiong)。2015。〈夢想照進現實——論新世紀以來中國農民工題材電影中的「中國夢」〉“Mengxiang zhaojin xianshi - lun xinshiji yilai zhongguo nongmingong ticai dianying zhong de ‘Zhongguomeng’ ” [Dreams in Reality: A Critique on ‘the Chinese Dream’ in Films on China’ s Rural Migrant Workers]，〈《甘肅廣播電視大學學報》Gansu guanbo dianshi daxue xuebao [Journal of Gansu Radio & Television University] 25(1): 61-63。〉

- 石勇 (Shi, Yong)。2013。〈「中國夢」，從機會平等開始〉“‘Zhongguomeng’, cong jihui pingdeng kaishi” [‘The Chinese Dream’ Starts from Equal Opportunities], 《南風窗》 *Nangfengchuang* [*South Reviews*] 8: 40-43。
- 任杰、張一夫 (Ren, Jie, and Zhang, Yi-Fu)。2011。〈農民工調查：夢想「市民化」，城市不是驛站〉“Nongmingong diaocha: mengxiang ‘shiminhua’, chengshi bushi yizhan” [Rural Migrant Workers’ Survey: the Dream of Citizenship, Cities are not Stage Stations], 《協商論壇》 *Xieshang luntan* [*Consultative Forum*] 3: 43-45。
- 成兆文 (Cheng, Zhao-Wen)。2004。〈化解「三農」問題，實現小康社會〉“Huajie ‘sannong’ wenti, shixian xiaokangshehui” [Solve the Problem of the “Three Rural Issues”, Build a Well-off Society], 《甘肅農業》 *Gansu nongye* [*Gansu Agriculture*] 211: 15-16。
- 江立華、谷玉良 (Jiang, Li-Hua, and Gu, Yu-Liang)。2016。〈農民工底層敘事——講述苦難與記敘幸福〉“Nongmingong deceng xushi - jiangshu kunan yu jixu xingfu” [Rural Migrant Workers’ Narrative: Articulating Suffering and Portraying Happiness], 《寧夏社會科學》 *Ningxia shehui kexue* [*Social Sciences in Ningxia*] 195: 117-123。
- 江臘生 (Jiang, La-Sheng)。2016。《新世紀農民工書寫研究》“*Xinshiji nongmingong shuxie yanjiu*” [Rural Migrant Workers’ Writing in the New Millennium]。北京 (Beijing)：人民 (People’s Press)。
- 吳介民 (Wu, Jieh-Min)。2011。〈永遠的異鄉客？公民身分差序與中國農民工階級〉“Yongyuan de yixiangke? gongmin shenfen chaxu yu zhongguo nongmingong jieji” [Strangers Forever? Differential Citizenship and China’s Rural Migrant Workers], 《台灣社會學》 *Taiwan shehuixue* [*Taiwan Sociology*] 21: 51-99。
- 李沛霖 (Li, Pei-Lin)。2021。〈戶籍制度改革區域差異對人口流動影響研究〉“Huji zhidu gaige quyu chayi dui renkou liudong yingxiang yanjiu” [A Study on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of Population Flows through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Reforms], 《人口與發展》 *Renkou yu fazha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27(6): 36-50。
- 李和平、吳焱 (Li, He-Ping, and Wu, Yan)。2011。〈電視文化對農民工的塑造〉“Dianshi wenhua dui nongmingong de suzao” [The Effects of Television Culture on Rural Migrant Workers], 《聲屏世界》 *Shengpin shijie* [*Voice & Screen World*] 10: 97-98。
- 李清 (Li, Qing)。2011。〈農民工，有夢想誰都了不起〉“Nongmingong, youmengxiang shui dou liaobuqi” [With Dreams, Any Rural Migrant Worker

is Amazing]，《悅讀》*Yuedu [Mook]* 4: 4-6。

- 李穎欣 (Li, Ying-Xin)。2019。〈農民工群體的影像書寫：現狀、路徑及問題——以央視《城市夢想》節目為例〉“Nongmingong qunti de yingxiang shuxie: xianzhuang, lujing ji wenti - yi yangshi chengshi mengxiang jiemu weili” [The Visual Representation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Reality, Approach, and Problem: My City Dream as an Example]，*《視聽》Shiting [Radio & TV Journal]* 2: 175-177。
- 周永康、王荊川 (Zhou, Yong-Kang and Wang, Jing-Chuan)。2020。〈大流動時代農民工的個體化生命歷程〉“Daliudong shidai nongmingong de getihua shengming lichen” [The Individual Passage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in the Age of Mass Migration]，*《江漢學術》Jianghan xueshu [Jianghan Academic]* 39(6): 16-26。
- 胡文嘉 (Hu, Wen-Jia)。2012。〈負壓前行，爲了夢想中的城市生活——90後農民工心理現狀掃描〉“Fuya qianxing, weile mengxiangzhong de chengshi shenghuo - 90hou nongmingong xinli xianzhuang saomiao” [Move Forward under Pressure to Live the Dream of City Life: A Sketch of the Psychological State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Born after the 1990s]，*《中國社會保障》Zhongguo shehui baozhang [China Social Security]* 10: 51。
- 范雨素 (Fan, Yu-Su)。2017/04/25。〈我是范雨素〉“Wo shi FanYu-Su” [I'm Fan Yu-Su]，*《騰訊新聞》Tengxun xinwen [Tencent News]*。Retrieved from: <https://news.qq.com/a/20170425/063100.htm> on Dec. 2, 2020.
- 姬鐵見 (Ji, Tie-Jian)。2018。《止不住的夢想：一個農民工的生存日記》*Zhibuzhu de mengxiang: yige nongmingong de shengcun riji [Unstoppable Dreams: A Rural Migrant Worker's Diary of Survival]*。臺北 (Taipei)：崧燁文化 (Sonbook)。
- 孫文凱 (Sun, Wen-Kai)。2017。〈中國的戶籍制度現狀、改革阻力與對策〉“Zhongguo de huji zhidu xianzhuang, gaige zuli yu duice” [The Reality and Challenge of China's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and its Resolutions]，*《勞動經濟研究》Laodong jingji yanjiu [Studies in Labor Economics]* 5(3): 50-63。
- 孫建 (Sun, Jian)。2017。〈收視效果與傳播意義的完美結合——評央視財經頻道《城市夢想·姑娘，不哭！》〉“Shoushi xiaoguo yu chuanbo yiyi de wangmei jiehe - ping yangshi caijing pindao chengshi mengxiang: guliang, buku!” [A Perfect Combination of Viewership and Dissemination: A Critique of CCTV's Financial Chanel *My City Dream: Don't Cry, Girl!*]，*《電視研究》Dianshi yanjiu [TV Research]* 330: 55-56。

- 孫偉、夏鋒 (Sun, Wei and Xia, Feng) 。2018 。〈以居住制度取代城鄉二元戶籍制度的改革路徑研究〉 “Yi juzhu zhidu qudai chengxiang eryuan huji zhidu de gaige lujing yanjiu” [A Research on How Residency System May Replace the City/Countrysid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 《經濟體制改革》 *Jingji tizhi gaige [Reform of Economic System]* 4: 26-30 。
- 孫晶 (Sun, Jing) 。2001 。〈葛蘭西的文化霸權理論及其質疑〉 “Gelanxi de wenhua baquan lilun ji qi zhiyi” [Gramsci’s Theory of Cultural Hegemony and Its Critique] , 《馬克思主義與現實》 *Makesi zhuyi yu xianshi [Marxism & Reality]* 1: 80-85 。
- 秦昕、徐敏亞 (Qin, Xi and Xu, Min-Ya) 。2013 。〈農民工：從夢想終結到夢想驅動〉 “Nongmingong: cong mengxiang zhongjie dao mengxiang qudong” [Rural Migrant Workers: From Dream Dissolution to Dream Initiation] , 《商界評論》 *Shangjie pinglun [Business Review]* 2: 82-86 。
- 張永宏、李靜君 (Zhang, Yong-Hong and Li, Jing-Jun) 。2012 。〈製造同意：基層政府怎樣吸納民眾的抗爭〉 “Zhizao tongyi: jiceng zhengfu zenyang xina minzhong de kangzheng” [Making Agreement: How Local Government Absorbs People’s Resistance] , 《開放時代》 *Kaifang shidai [Open Times]* 7: 5-25 。
- 張盼 (Zhang, Pan) 。2019 。〈抒寫凡人夢想，彰顯人文情懷——淺談央視真人秀《城市夢想》〉 “Shuxie fanren mengxiang, zhangxian renwen qinghuai - qiantan yangshi zhenrenxiu chengshi mengxiang” [Writing Ordinary People’s Dreams and Glorifying Humanities] , 《戲劇之家》 *Xiju zhi jia [Home Drama]* 328: 52-53 。
- 張敏 (Zhang, Min) 。2017 。〈「硬」法規融合「軟」故事〉 “‘Ying’ fagui ronghe ‘ruan’ gushi” [“Hard” Regulations and “Soft” Stories] , 《廣電時評》 *Guandian shiping [Radio & TV Review]* 7: 20-21 。
- 張瑤 (Chang, Yao) 。2020/06/23 。〈致敬35周年——路雖遠，行者必至，遠東將慈善之路進行到底〉 “Zhijing 35 zhounian - lusuiyuan, xingzhe bizhi, yuandong cishan zhilu jingxing daodi” [35th Year Anniversary: Far East Charity Continues to Reach out] 。 Retrieved from: <https://www.fe-nm.com/eportal/ui?pageId=344008&articleKey=555693&columnId=339848> on Jan. 18, 2022.
- 張慧瑜 (Zhang, Hui-Yu) 。2014 。《危機時代與主體建構：新世紀以來中國大眾文化研究》 *Weiji shidai yu zhuti jiangou: xinshiji yilai zhongguo dazhong wenhua yanjiu [The Age of Crise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ubjectivity: China’s Popular Culture Studies in the New Millennium]* 。臺北 (Taipei) : 秀威 (Showwe) 。

- 張權生 (Zhang, Quan-Sheng) 。2018。〈論農民工題材電影的「中國夢」主題〉 “Lun nongmingong tica dianying de ‘Zhongguomeng’ zhuti” [On the Theme of the Chinese Dream in China’s Rural Migrant Workers’ Film] , 《電影文學》 *Dianying wenxue [Film Literature]* 11: 4-7。
- 曹穎 (Cao, Ying) 。2009/01/05。〈一個外來打工者城市夢想〉 “Yige wailai dagongzhe chengshi mengxiang” [An Outsider’s City Dream] , 《中國報導》 *Zhongguo baodao [China Report]* 。 Retrieved from: <http://chinareport.sinoperi.com/zh20091/939911.jhtml> on Dec. 8, 2020.
- 曹默 (Cao, Mo) 。2017。〈平凡勞動者的真誠禮讚〉 “Pingfan laodongzhe de zhencheng lizan” [A Tribute to Ordinary Workers] , 《廣電時評》 *Guangdian shiping [Radio & TV Review]* 12: 71-72。
- 梁宇廣 (Liang, Yu-Guang) 。2011/02/11。〈中國新生代農民工「上游」夢：無法回歸農民身份〉 “Zhongguo xinshengdai nongmingong ‘shangyou’ meng: wufa huigui nongmin shenfen” [China’s New Generation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Dream of “Upward Mobility”: No More a Peasant] , 《新華網》 *Xinhua wang [Xinhua Net]* 。 Retrieved from: <https://www.chinanews.com.cn/sh/2011/02-11/2836268.shtml> on Jan. 12, 2021.
- 郭于華 (Guo, Yu-Hua) 。2011。《傾聽底層：我們如何講述苦難》 *Qingting diceng: women ruhe jiangshu kunan [Listen to People at the Bottom]* 。桂林 (Guilin) : 廣西師範大學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
- 郭春林 (Guo, Chun-Lin) 。2016。〈當「新工人」遭遇「夢想秀」——一個文化研究的媒介分析實踐〉 “Dang ‘xingongren’ zaoyu ‘mengxiangxiu’ - yige wenhua yanjiu de meijie fenxi shijian” [When “New Workers” Meet “Reality Show”: A Practice of Cultural Studies on Medium Analysis] 。《文學與文化》 *Wenxue yu wenhua [Literature and Culture Studies]* 4: 58-72。
- 陳卓 (Chen, Zhuo) 。2019/06/02。《〈城市夢想〉第二季 我是你的臂膀》 “Chengshi mengxiang dierji: woshi nide beibang” [City Dream Season 2: I’m Your Arms] 。 Retrieved fro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x23tp9jrqq> on Dec. 8, 2020.
- 彭維鋒 (Peng, Wei-Feng) 。2015。〈從苦難遭際到主體建構：當代農民工鏡像的嬗變與成長〉 “Cong kunan caoji dao zhuti jiangou: dangdai nongmingong jingxiang de shanbian yu chengzhang” [From Suffering to Building Subjectivity: The Change and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Rural Migrant Workers] , 《中國勞動關係學院學報》 *Zhongguo laodong guanxi xueyuan xuebao [Journal of China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Relation]* 29.2: 59-62。
- 焦必方 (Jiao, Bi-Fang) 。2005。〈三農問題：一個影響中國經濟發展的瓶

- 頤〉“Sannong wenti: yige yingxiang zhongguo jingji fazhan de pingjing” [The Three Rural Issues: An Obstacle that Affects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世界經濟文匯》 *Shijie jingji wenhui* [World Economic Papers] 4: 122-127。
- 黃宗儀 (Huang, Tsung-Yi)。2020。〈中港新感覺：發展夢裡的情感政治〉 *Zhonggang xinganjue: fazhan mengli de qinggan zhengzhi* [The New Feeling Between China and Hong Kong: The Politics of Affect in the Dream of Development]。新北(New Taipei City)：聯經 (Linking)。
- 黃宗儀、李紀舍 (Huang, Tsung-Yi and Li, Chi-She)。2010。〈新自由主義經濟人的自我敘述：中國富人傳的生命政治〉 “Xinziyou zhuyi jingjiren de ziwo xushu: zhongguo furenzhuang de shengming zhengzhi” [Cultural Governance of New Economic Man: Entrepreneur’s Self-Narrative in Contemporary China], 《文化研究》 *Wenhua yanjiu*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11: 63-90。
- 楊志明 (Yang, Zhi-Ming)。2018。〈情繫農民工〉 “Qingxi nongmingong” [Feeling for Rural Migrant Workers], 《中國政協》 *Zhongguo zhengxie* [China Political Consultative] 4: 88-89。
- 溫鐵軍 (Wen, Tie-Jun)。2005。《三農問題與世紀反思》 *Sannong wenti yu shiji fansi* [The Three Rural Issues and Millennium Reflection]。北京 (Peiking)：三聯 (Joint)。
- 溫鐵軍、楊海霞 (Wen, Tie-Jun and Yang, Hai-Xia)。2013。〈對話溫鐵軍——三農問題與中國道路〉 “Duihua Wen Tie-Jun - sannong wenti yu zhongguo daolu” [A Conversation with Wen Tie-Jun: the Three Rural Issues and the Chinese Path], 《中國投資》 *Zhongguo touzi* [China Investment Magazine] 11: 24-35。
- 劉紫涵 (Liu, Zi-Han)。2013。〈推進農民工市民化，為實現「中國夢」插上翅膀——解決農民工現實尷尬，縮小貧富差距〉 “Tuijin nongmingong shiminhua, wei shixian ‘Zhongguomeng’ chashang chibang - jiejie nongmingong xianshi ganga, suoxiao pinfu chaju” [Promote Rural Migrant Workers’ Urbanization, Realize “the Chinese Dream”: Improve Rural Migrant Workers’ Real Conditions, Narrow the Rich-poor Gap], 《經濟研究導刊》 *Jingji yanjiu daokan* [Economic Research Guide] 196: 47-48。
- 劉暢 (Liu, Chang)。2017。〈個體苦難與社會政策：基於對打工文學的考察〉 “Geti kunan yu shehui zhengce: jiyu dui dagong wenxue de kaocha” [Individual Suffering and Social Policy: An Observation on ‘Dagong’ Literature], 《社會政策研究》 *Shehui zhengce yanjiu* [Social Policy Research] 1: 125-135。

- 潘毅、任焰 (Pan, Yi and Ren, Yan) 。2018。〈農民工的隱喻：無法完成的無產階級化〉 “Nongmingong de yinyu: wufa wancheng de wuchan jiejihua” [Rural Migrant Workers’ Metaphor: Unfinished Proletarianization]，〈農民工與新工人：當代中國階級問題研究〉 *Nongmingong yu xingongren: dangdai zhongguo jieji wenti yanjiu* [Peasant Workers and the New Working Class: On Contemporary Class Issues in China]，潘毅、孟捷 (Pan, Yi, and Meng, Jie) 主編，頁100-115。新竹 (Hsinchu)：國立交通大學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 潘毅、盧暉臨、張慧鵬 (Pan, Yi, Lu, Hui-Lin, and Zhang, Hui-Peng) 。2010。《大工地上中國農民工之歌》 *Dagongdi shang zhongguo nongmingong zhi ge* [The Song of China’s Rural Migrant Workers on Construction Sites]。香港 (Hong Kong)：商務 (Commercial)。
- 韓長賦 (Han, Chang-Fu) 。2013。〈實現中國夢，基礎在「三農」——把農村建設成爲農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園。〉 “Shixian Zhongguomeng, jichu zai ‘sannong’ - ba nongcun jianshe chengwei nongmin xingfu shenghuo de meihao jiayuan” [Realize the Chinese Dream on the Basis of the “Three Rural Issues” : Making Countryside the Beautiful Homes for Rural Migrant Workers]，〈人民論壇〉 *Renmin luntan* [People’s Tribune] 10: 8-10。

二、英文書目

- Ahmed, Sara. 2004. “Affective Economies,” *Social Text* 79(22.2): 117-139.
- . 2010. *The Promise of Happines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Berlant, Lauren. 2011. *Cruel Optimis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Cai, Fang, and Dewen Wang. 2008. “Impacts of Internal Migration on Economic Growth and Urban Development in China,” in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Within and Across Borders: Research and Policy Perspectives on Internal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edited by Josh DeWind and Jennifer Holdaway, pp. 245-272. Genev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 Dauncey, Sarah. 2002. “Screening Disability in the PRC: The Politics of Looking Good,” *China Information* XXI(3): 481-506.
- Highmore, Ben. 2017. *Cultural Feelings*. New York: Routledge.
- Knight, Deirdre Sabina. 2006. “Madness and Disability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Film,” *Journal of Medical Humanities* 27(2): 93-103.
- Kohrman, Matthew. 2005. *Bodies of Difference: Experiences of Disability and Institutional Advocacy in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Wacquant, Loïc. 1993. "Inside 'The Zone': The Social Art of the Hustler in the American Ghetto," in Pierre Bourdieu et al., eds, *The Weight of the World: Social Suffering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trans. Priscilla Parkhurst Ferguson et al., pp. 140-16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Robbins, Bruce. 2007. *Upward Mobility and the Common Good: Toward a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Welfare Stat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laughter, R. Joseph. 2007. *Human Rights, INC.: The World Novel, Narrative Form, and International Law*.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